

中國威權政體下的集體抗議： 台資廠大罷工的案例分析

陳志柔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本文以 2014 年廣東台資鞋廠延續十餘天的 4 萬人罷工為案例，呈現在當今中國威權政體下，大規模集體抗爭的動員和結果，導因於多重機制的互動過程。影響大罷工的社會機制包括：(1) 空間環境及網路空間的人際關係；(2) 動員的自發性；(3) 外來勞工組織的支援；(4) 法律主義的權益訴求；(5) 情感、符號、謠言的驅動作用。面對工人集體抗爭，資方和地方政府各有不同的利益考量和誘因導向，無法合力及時瓦解罷工。大規模的勞工集體抗議，標舉國家法律做為訴求，佐以有效的動員機制，在國家試圖納入以法制做為統治合法性的過程中，得到著力點，也衝擊了資本家和地方政府慣存的政商互利治理模式。地方政府藉由公安、情治、工會、社保等部門，雖然未必能防止大罷工的發生，但有能力控制大罷工的動態發展，由此順勢建立集體抗爭的制度化，避免損害威權政體的統治合法性。

關鍵詞：集體抗議、罷工、威權政體、動員、中國

Popular Protest in an Authoritarian Regime: A Wildcat Strike in Southern China

Chih-Jou Jay Chen

Institute of Sociology, Academia Sinica

Based on a case study of a workers' wildcat strike in a Taiwanese footwear factory in Guangdong,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protest mobilization and government response in the Chinese authoritarian regime.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the massive 10-day strike involved a series of mechanisms, including: (1) the unique ecology of the factory campus that nurtured close-knit worker networks; (2) workers' spontaneous mobilization that lacked both central leadership and autonomous organizations; (3) advice and instruction from independent labor NGO activists; (4) appeals to citizenship rights and legalism; and (5) mobilization through emotions, ideological symbols, and rumors. The company and local government had different interests and incentives, and thus could not collude on curbing the strike. The local state, despite not being able to prevent a strike from happening, is able to contain a massive strike, relying on its police, official trade unions, and Party system. Nevertheless, collective action by disadvantaged groups pressured the local government's implementation of laws and policies from above. Thus, mass protest played a crucial role in the dynamic political process, exemplifying the changing nature of state-society relations in China.

Keywords: protest, protest mobilization, authoritarian regime, China

一、研究問題

在當今中國的政治體制下，大規模的集體抗爭，如何成為可能？本文以 2014 年廣東台資鞋廠的大罷工為案例，回答這個問題。影響大規模集體抗議的發生、持續和落幕，有諸多因素，本文聚焦於微觀層次的行動者之間的互動，呈現大規模社會衝突的內在動力是由國家與社會關係所塑造。具體的研究問題是：在當今中國共產黨的黨國體制下，何以一個台資鞋廠的 4 萬人大罷工，可以發動並持續十餘天？罷工者靠什麼組織動員？資方和政府抗爭過程中，如何化解衝突？這樣的大罷工，體現了當前中國的政治體制和社會結構、以及國家與社會的關係，什麼樣的特質和變遷軌跡？

近年來，中國社會各式各樣的集體抗議事件，日有增長；無論是抗議群體、議題、手段、政府回應方式等，也日趨多樣性。從媒體報導及網路訊息中，集體抗爭的「人、事、時、地、物」基本上會得到呈現，我們得以知曉「誰在抗議」、「為什麼抗議」。但是進一步的訊息，例如：集體抗爭的成因、醞釀及動員過程、抗議群體的領導和組織方式、政府和資方的回應策略、抗爭過程中的談判和後果，仍需要更多的經驗研究和理論命題。本文的台資廠罷工案例，是中國近年來非國有企業部門，最大規模的罷工，它當然不是「典型案例」或「代表案例」，因為就參與人數、持續天數、媒體關注等方面，它都是「非常態」。本文的目的是透過此一案例，解析當代中國大型集體抗爭中行動者之間的互動過程，分析集體抗爭的動員過程受到了哪些機制的影響，並呈現大罷工是置身於什麼樣的政治社會情境當中。這些機制及其影響，凸顯了當前中國政治社會變遷的特質，也對於我們瞭解當代中國或其他威權國家的集體抗爭事件及國家與社會關係，提供觀察及思考的參考架構。

社會運動及威權政體的概念架構和理論命題，對當代中國的集體抗爭，提供了參考的分析角度。同時當代中國的實證經驗，也會對社

會運動和威權政體的理論命題，注入新的元素。本文以國家與社會的關係為分析框架，在微觀層次，呈現國家與社會雙方各自的行動者，如何組織及互動，從而影響了集體抗爭的發展。本文的研究案例顯示，當前中國的勞工群體，雖然沒有核心領導的公開反抗，也無法形成跨廠的持續性組織，但在特定的環境和條件下，勞工並非沒有可能形成大規模、持續數天的集體行動，且訴求的議題會具有制度性的後果。這樣的集體行動，在國家試圖納入以法制作為統治合法性來源的過程中，得到著力點。大規模的勞工集體抗議，以國家法律為公開訴求，即使沒有公開核心領導也無串聯組織、但有自發性的私下小群積極份子的策動、佐以有效的動員工具，衝擊了資本家和地方政府既往的政商互利治理模式，也改變了既有的國家與社會關係。國家在處理集體抗爭事件的過程中，藉由國家機器對社會抗爭的放收調控，劃清集體抗爭行動的紅線，國家擔任社會衝突的仲裁者，也由此建立對抗爭事件的制度化能力，在短期內控制社會衝突，避免損害威權政體的合法性。

二、威權體制和集體抗爭

（一）罷工的政治脈絡：威權體制的分權化

當代中國的國家性質及國家與社會關係，如何影響集體抗議的動員過程和抗議形式呢？當前的威權政體，最重要的核心要素就是「分權」、「去集權化」(decentralization)；所謂的「分灶吃飯」、「放權讓利」，都是中央政府在經濟決策、財政分配中，讓地方政府享有一定的自主空間。如此的國家體制，是中國在經歷了 30 年的市場經濟改革後，仍未出現工人運動的重要因素之一（陳峰 2009）。分權是當代中國威權體制為求有效統治的政策後果，它源於中央統轄權與地方治理權之間的持續緊張和不相容；如此的矛盾是持續的、動態的，那麼該如何維繫威權體制的持續運作呢？周雪光 (2011) 指出關鍵在於嚴密的科層組織和國家一統觀念，但它們又並非滴水不漏、完全有

效。是以幾個應對的機制也逐漸發展出來，其中最重要的是在制度安排上允許各地政府因地制宜，中央保持決策一統性，但地方有執行靈活性。

因地制宜的靈活性，也展現在各地的勞動體制 (labor regime)，主要的制度內容包括：地方化的勞動監管、最低工資、社會保險（以下簡稱社保）制度等。以本文的大罷工為例，工人提出的訴求是社保養老和住房公積金，這是中央近十年來極力推動的政策，但是地方政府在分權化的制度脈絡下，仍舊「量力而為」，有各自的社保養老金執行細則，甚至暫免徵收住房公積金。

分權化後的因地制宜政策，碰到工人以守法主義 (legalism) 做為集體抗爭的核心訴求時，就會將中央政策和地方對策的落差曝光，成為工人集體行動的籌碼。當地方政府面臨社會集體抗爭時，李靜君以「去集權化的法律威權體制」 (decentralized legal authoritarianism)，呈現中共威權政體處理社會群體集體抗議的制度特性和行為模式 (Lee 2007)。這種「去集權化的法律威權體制」，即使東北和南方的工人集體抗爭存在很多差異性，他們也呈現了共同的特質，即：原子化的行動性 (cellular activism)、以地方政府為目標、及守法主義的意識型態 (Lee 2007: 10)。也就是說，由於中國的中央政府賦予地方高度自主空間，地方分權的治理結構，讓跨廠跨地區工人無法指向共同的抗爭對象，抗爭常常限縮於個別的工作單位中，抗爭模式也趨向於去中心化以及原子化。工人抗議的對象，主要以地方部門或官員為目標，而非更高層的省或中央政府，更非普遍意義的民主訴求 (Perry 2009)；但集體抗議的話語或訴求，即使是不同類型的工人群體和議題，但最終都匯聚到法律領域 (Chang and Brown 2013; Gallagher 2005; Lee 2007)。雖然法律是全國普遍適用，但中國各地區詮釋、執行中央法律，本就存在很大地方差異，因此勞資衝突及工人抗爭的形式，跟地方勞動體制及勞動過程中的權力架構和法律落實，息息相關。

（二）集體抗議的動員機制：空間環境、人際關係、情感動員

國家的性質，會影響社會運動和集體抗爭的內容和形式。但集體抗爭的發生仍在於抗議群體本身的動員過程。當代中國工人的罷工，依靠哪些組織方式和動員機制？以歐美和台灣的社運經驗而言，隨著政治民主化和民間社會的發展，最成功的社運組織方式是運用社會關係中的各種連結，以及正式組織的目標取向和專業能力，達到政治反抗或集體動員的目的（Tarrow 1998: 123-140；何明修 2011；邱毓斌 2011）。但中國從 1980 年代改革以來，工會仍是國家的附屬組織，工會在勞資鬥爭中無能為力，且在工人心中沒有地位，甚至工人在官方工會外另外尋求建立自己的組織(Chen 2003)。從 2000 年以來，部分案例顯示，工會在工人和政府之間，以及勞資爭議之間，開始扮演中介角色(Chen 2010)。但以廣東近年來多數的私營和外資企業的工人罷工為例，工會並不是工人抗爭的載體，工人也不具備工會意識或展現組織工會的需求(Chan and Siu 2012)。

就當代中國的工人集體抗爭而言，工人非政府組織（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以下簡稱 NGO）倒是扮演不可忽視的角色。NGO 並不會帶頭直接與國家對抗衝突，也避免跨地域串聯發展。它們的貢獻和角色，是針對特定的政策範疇（如環保、反汙染、公共衛生、維權）和社會群體（如農民工、女工、女人），提供訊息或服務，但這樣當然無法改變既有的勞資不平等(Sun and Zhao 2008; Tong 2005, Yang 2005; Chan 2013; Lee and Shen 2011; Friedman 2009; Friedman and Lee 2010; Spires et al. 2014)。它們參與的形式，多跟政府合作，或成為政府「買服務」的外圍組織(Hsu and Hasmath 2014)；它們協助的對象，多是個人，不是群體。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基層民間組織，擁有高素質的民間人力，不仰賴政府資源，持續提供社會服務(Spires et al. 2014)。也開始出現「工運型勞工 NGO」，走在政府容忍的邊緣，協助工人進行集體談判、建立改選工會、救濟工人領袖等(Li and Duan 2013)。但也有學者指出，勞工 NGO 並不如外界想像的自主

有活力，反而在社會資源方面產生匱乏 (Franceschini 2014)。2015 年開春以來，成立多年的廣州中山大學勞動研究中心突然被關閉，也讓人對中國 NGO 的前景，尤其是跟勞工有關的 NGO，不敢過於樂觀 (Wong 2015)。

NGO 組織仍處於提供社會服務的階段，沒有帶頭倡議集體抗爭，那麼大規模的罷工，是如何產生呢？原因之一在於：威權政體可以壓制社會運動組織，但卻沒辦法壓制人們的日常互動和社會關係，如果有特定的空間環境及訊息傳播，往往就會成為集體行動的動員基礎（趙鼎新 2007a: 287-302）。趙鼎新關於在北京 1989 年民運及 1999 年反美示威的研究成果，都呈現了空間環境影響社會運動的經驗和命題。他的經驗研究引伸的理論意涵是：當社會中的公民組織發展有限時，社會運動的動員往往帶有高度的自發性 (spontaneity)，且高度依賴被動員群體的生活和工作環境；在這種情境下，社會運動的發展，更可能是由情感的主導；而不是由運動組織的策略來驅動；因為在威權社會中，集體行動的基礎是情感不是理性，因此運動行動者往往會依照自己最熟悉的方式和話語來行事，亦即受到傳統文化的影響最大（趙鼎新 2007a, 2007b；Zhao 2013）。

在社會運動的理論脈絡中，1960 年代之前的集體行動研究，認為集體行動是非理性的感情所致，是病態的表現，例如 Gustave Le Bon 的烏合之眾研究 (Le Bon 2002)。直到 1980 年代末期和 1990 年代，情感對於社會運動的影響，才又逐漸受到重視（趙鼎新 2007a；Yang 2000）。當運動的組織力量薄弱時，運動的參與者就更容易被其他人的情緒所感染，運動的發展就更可能會被群眾的情緒所左右（趙鼎新 2007a: 80）。情感對於集體行動的作用，往往不僅僅是動員的工具，且而是抗爭的動力來源，集體抗爭是因為「情感受到傷害」，而非僅是實質利益受到傷害。在抗爭過程中，行動者往往使用文化中的話語或文本，因為他們的情感連結了他們的價值和信仰，即使沒有實質好處，也必須做「對」的行動；在這個意義上，集體行動的情感邏輯就變成社會衝突時的道德語法 (Honneth 1996)。

情感動員和表達，依賴各種傳播方式和媒體，如標語、口號、海報、影像等。在電腦網路和社交媒體時代，這些表達方式的能量暴增，傳播面廣、速度快、持續久。當代中國近年來的集體抗爭，電腦網路和手機通訊，本已經在訊息傳播上，扮演重要的角色，若考慮網路對情感動員的影響，更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參見 Yang 2013）。

本文所述的台資廠大罷工，如下文所述，的確受到廠區生態環境、廠區及生產線的社會關係、廠外勞工組織、電腦網路和社交媒體的影響，工人擷取自既有文化和黨國教條的價值和符號，也成為情感動員的要素。

（三）國家的回應策略

除了抗爭者本身的動員能量以外，國家面對集體抗爭的回應模式和策略運用，也塑造了抗爭的動員過程和抗爭結果。蔡永順強調集體抗爭的成敗，往往在於能否利用國家內部機構間分化的政治空間，而從中尋求支持。集體抗爭若缺乏組織的支持，抗爭者只能尋求國家機構內部的政治空間來獲得支援，當然，政治空間會隨著抗爭的規模人數、抗爭領導者、參與者的社經背景、媒體曝光，以及參與者與政府內部的人際網絡等因素而改變 (Cai 2010)。媒體對集體抗議的報導，對於地方政府，顯然會產生壓力，也提升上級政府介入的可能性 (Cai 2010: 110-125)。當今中國媒體業興起，尤其商業媒體的市場導向，對於大型集體抗爭，並不避諱，而會爭相報導，從而增加了地方政府的行政壓力，也監督了地方政府的行為模式 (Shirk 2010)；雖然媒體有助於事件曝光，監督政府，但畢竟無法改變行動者的既有行為模式和後續發展 (Hess 2015)。

國家機構內的不同部門，對於集體抗爭有不同的盤算和利益，並不是每個部門機構都有志一同，行動一致。例如維穩單位，甚至不介意集體抗爭的頻繁發生或規模擴大，因為如此才凸顯維穩或國家安全部門的重要性，也有助於這些部門的預算分配和資源爭取 (Lee and Zhang 2013: 1493)。且中央政府藉由地方的維權抗議，可繞過地方政

府的代理人，直接掌握地方社會浮現的重要問題，考察地方的治理能力 (O'Brien and Li 2006)。當然，如此政治操作過程，也會順勢增強中央政府的威望，補強其流失的合法性。政府在集體抗爭中的角色，也在轉變之中。基層政府從過去監督者、執法者的角色，轉變成協調者（蔡禾 2010）。中國政體的制度邏輯賦予基層官員相當大的靈活性和自主性，但關鍵是，基層官員如何運用這種靈活性？

李靜君和張永宏的研究成果 (Lee and Zhang 2013) 呈現地方政府的靈活性；地方政府藉由涉入集體抗爭的談判過程，達到維穩的政策目標，由此呈現 Michael Mann 所謂的國家基礎能力 (Mann 1984)，如何滲透到社會抗爭的治理之中。基層政府爲了吸納社會衝突，會採取三種方式：檯面下討價還價 (protest bargaining)、官僚吸納 (bureaucratic absorption)、及恩庇侍從主義 (patron-clientelism)。政府最常用的策略就是「花錢買穩定」；但花錢之前，地方政府會偏好第二機制，即：鼓勵民眾通過現有的官僚制度管道，如信訪、勞動仲裁、訴訟、調解等，但這些制度化管道往往需要舉證、曠日廢時。最後，恩庇侍從主義原指人民對黨國效忠，以換取政府提供的各種好處，當今這種機制只適用於對黨國體制高度依賴的群體，如：公務員、黨員、退伍軍人、退休老人等。藉由這三種機制，在市場化程度越來越高的中國，政府的權威和公民的權利成爲可被交易的商品；所以市場經濟支撐了威權主義治理，兩者相互爲用，形成了「議價的威權主義」(Bargained Authoritarianism)。這也解釋了爲何大部分的社會衝突和集體抗爭，目前短期內看來並沒有減損中共黨國的統治合法性 (Lee and Zhang 2013)。

三、罷工事件的場景和資料來源

大罷工的場景發生於廣東省東莞市高埗鎮的裕元鞋廠。廣東省珠江三角洲是當代中國最早發動經濟改革、最早引入外資的地區，區內包括深圳、東莞、廣州、佛山等發達大城市。1980 年代初期，廣東、

福建的特區經濟開始發展，廣東在財政、物資分配、經貿政策方面，比中國其他省市，擁有更大的自主權，也留存更多盈餘（傅高義 2008）；另一方面，廣東在經貿規範、廠商稅費等經濟治理方面，實施更大範圍的因地制宜的土政策，往往政商結合，利益輸送，共謀利用集體土地資源、剝削農民工勞動力，成為改革以來「廣東模式」的特色（傅高義 2008；Wu 1997）。2000 年中以來，中央政府開始利用財政與金融政策，進行宏觀調控，外資（尤其是勞力密集、高污染的加工出口業），在稅費等優惠上受到限制，勞動合同法大幅增加製造業的成本，廣東政府也企圖透過「騰籠換鳥」的產業升級政策，促進地方城市化和產業升級。儘管相較於其他省市，廣東廠商仍得到較大的政策彈性，但地方政府逐漸無法全盤照顧廠商利益，珠三角廠商日發感受社保、勞力成本上漲的經營壓力（鄭志鵬 2014）。

裕元鞋廠的母公司是台灣上市企業寶成集團，它是全球最大的品牌運動鞋及便服鞋製造商。2013 年時，寶成集團全球總員工數約四十九萬人，中國員工數約二十萬人（越南 16 萬人，印尼 12 萬人），在高埗的員工數達 4 萬 2 千人，是裕元在中國最大的生產基地。以全球品牌運動鞋及休閒鞋市場的批發價格計算，裕元的市佔率佔約 20%。¹ 高埗鎮是東莞市下直轄的 32 個鎮區之一，面積有 35 平方公里，有大量的外來人口，2012 年時，外來暫住人口達 13 萬人，男女比例約是 6:4。² 以次看來，裕元的員工人數，約占了高埗外來人口的三分之一。根據一位裕元工人的估算，裕元男女工人比例約是 3:7。異於沿海電子廠，裕元有不少年資高的工人，5 年以上工齡者，大約占 70%；10 年以上的約占 10% 至 15%。³

本文資料來源主要是作者的田野訪談，我於 2014 年 4 月下旬到 5

1 資料來源：寶成國際集團，2014，〈寶成國際集團法人說明會資料〉（網址 <http://www.pouchen.com/download/shareholders-meeting/140319%20pcc%20presentation-ch%20ml.pdf>，取用日期：2015 年 10 月 28 日）。

2 計算自東莞市統計調查網，2013，〈東莞統計年鑑〉（網址 http://tjj.dg.gov.cn/website/flaArticle/art_show.html?code=nj2013&fcount=2，取用日期：2015 年 10 月 28 日）。

3 摘自工評社，2014，〈與裕元一位老工人的深度訪談〉，4 月 27 日（網址 http://blog.sina.com.cn/s/blog_ed2baf420101wdoo.html，取用日期：2015 年 10 月 28 日）。

月上旬，罷工的尾聲之際，在廣州、深圳訪談勞工 NGO 人士，尤其是參與本次罷工事件的張治儒和陳海輝，在東莞及高埗訪談裕元的員工，含大陸幹部（以下簡稱陸幹）、台籍幹部（以下簡稱台幹）、工人、離職員工、地方幹部等；其後也於台灣繼續訪談裕元現任或離職台籍幹部；共約三十五人次。由於本文作者過往十年就已經熟識東莞裕元的多位台籍幹部，累積了對該公司的人際資源和背景瞭解，對於 NGO 人士也有間接關係。基於受訪者的信任及他們個人的工作經驗，我針對罷工的訪談，進行得非常有效率，得到非常豐富詳實的訊息。同時我也參考媒體報導、網站訊息，針對相關訊息逐一核實。由於裕元的事件經海內外媒體報導，本文以真名敘述；NGO 人士張治儒，本就是公眾人物，因此不隱其名。但本文提及的其他受訪者，均為化名。

（一）3 月中至 4 月 5 日：從立案申訴到聚眾堵路

大罷工最早被媒體報導的第一幕，是 4 月 5 日的工人集體抗議堵橋事件。但大罷工的導火線，源於 3 月中旬時，180 名工人向東莞社保局立案投訴，投訴資方社保繳交的工資基數遠低於實質工資，並且認為資方以臨時工身分為員工投保，與員工簽立的合同又是無效合同。與此同時，百餘名工人也向住房公積金管理中心投訴，稱資方逃避繳交公積金。此一投訴事件逐漸在工人群體中擴散。⁴

3 月 28 日，裕元廠區內發生了第一起工人集體聚眾事件。當天下午，兩百餘名工人齊聚廠區內的稍潭員工活動中心，地方政府的社保局、勞動局、維穩人員，都在場。當天的議題仍是社保基數、臨時工身分、勞動合同無效等。廠方趁機釐清解釋，但工人不聽，頻頻打斷。當天會談沒有結論，廠方承諾工人，會在 4 月 14 日，公布公司的解決方案。⁵

但 4 月 14 日還沒到，4 月 5 日就發生了圍橋堵路事件。5 日下午

4 沈經理訪談，2014 年 4 月。

5 路經理訪談，2014 年 4 月。

兩點半左右，一千餘人聚集在高埗廠區附近的清水公園，隨後約有三十餘名工人，轉個彎就上了旁邊的高埗大橋，此時現場警方部署反應不及，幾十個人瞬間就把大橋堵住了，前後達 3 小時之久。

4 月 6 日至 8 日，海內外報章媒體，多數引用 4 月 5 日中國新聞網的報導及社交網站的描述和圖片（新浪微博、百度貼吧、中國茉莉花網站）⁶。中國新聞網（以下稱中新網）的主要內容是：「幾千名員工因質疑廠方以臨時工標準為工作十多年的員工購買社保，與員工簽訂無效勞動合同等欺瞞行為進行抗議」。網路貼文也提及工人「聽說廠裏要召開記者會瞭解員工的心聲，工人們等了很久，但除了員警外，不見記者及廠方負責人的蹤影。」⁷

（二）4 月 14 日 大罷工爆發

4 月 5 日堵橋事件之後，工人們的 QQ 群持續熱烈討論，深圳工人維權組織「春風服務社」張治儒主任，也於此時開始加入 QQ 群。從 4 月 10 日開始，張治儒成了 QQ 群裏的活躍人物。

4 月 13 日凌晨，張治儒發了「第一封公開信」到 6 個 QQ 群。其中提到：「大部分工友還是非常的勇敢，明確表示如果 14 日工廠的答覆不滿意，就決定採取行動，開始停工，不管其他工友怎麼想」。⁸ 4 月 13 日中午，張治儒及另外 3 名同事，約了三廠、六廠的 8 名工人在高埗見面。但張治儒等人還沒見到工人，就被警方留置盤查。⁹

大罷工的序幕從 4 月 14 日下午拉起。14 日上午，廠方開始宣導

6 中國新聞網，2014，〈東莞最大鞋廠幾千工人抗議廠方社保標準過低〉，4 月 5 日（網址 <http://www.chinanews.com/sh/2014/04-05/6034322.shtml>，取用日期：2015 年 10 月 28 日）；新浪微博 @darkumnm；2014 年 4 月 5 日（網址 <http://wickedonna2.tumblr.com/post/81780266638/4-5>，取用日期：2015 年 10 月 28 日）；中國茉莉花革命網站，〈東莞台資鞋廠數千人維權堵路〉（25 圖），2014 年 4 月 6 日（網址 <http://www.molihua.org/2014/04/22.html>，取用日期：2015 年 10 月 28 日）。

7 自由亞洲電台，2014，〈東莞台資鞋廠數千人罷工堵路抗議〉，4 月 6 日（網址 <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shehui/yf-04062014101935.html?searchterm:utf8:ustring=%E8%A3%95%E5%85%83>，取用日期：2015 年 10 月 28 日）。

8 第一封公開信是分兩次發到群中，有兩、三個版本，後來在 QQ 空間上是最完整的，2014 年 4 月 17 日。公開信全文參見張治儒 2014（網址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d8d48790101jpol.html，取用日期：2015 年 10 月 28 日）。

9 張治儒訪談，2014 年 4 月。

下午要貼出的公告內容。該公告主要內容是，廠方將自 5 月 1 日起，按 7 個投保級別，繳交社保養老金，最低為 1,910 元、最高為 6,500 元，公司每個月繳交 14%，員工每月繳交 8%，新方案在今年 5 月 1 日全面展開，預計 2015 年年底前，將完成全員足額投保。但方案僅提到未來全員足額投保，並沒有說明補繳及回溯的問題，也沒有觸及已繳但基數不足的問題，且未來的方案，也不是以實領工資做為基數。

14 日中午開始，八廠、制一底廠、老三廠的工人，午休後進廠打完工卡，就直接出來不上工了，工人們和廠方幹部在文化廣場面對面會談。會談過程中，廠方幹部拿出海報試圖解釋工人對「臨時工」、「公司社保給付為 0」的誤會，也想說明公司的方案，但工人不聽，海報也馬上被工人撕掉，爾後部分工人拉起橫幅到廠區外的高埗街道遊行，交通癱瘓，大批公安警力到場，有工人被特警打得很慘，也有人被捕。

14 日晚上，東莞公安的國保又來找張治儒，要求他發言制止罷工，張治儒於是在 QQ 群中，發了他的第一份聲明，其中重點是：「暫時中止與裕元工友們的一切聯繫。待工友們回歸理性和依法維權後，我們再考慮是否恢復與工友們的連繫。」¹⁰ 但是這份 14 日晚上的聲明，顯然沒有影響到 15 日的後續罷工行動。

4 月 15 日，罷工第二天，新三廠的數千名員工，也離廠加入到罷工隊伍，受到萬名工友的歡呼。15 日當天已經有新三廠、老三廠，制一鞋廠，制一底廠，加元一廠，上江城六、七、八廠罷工，估計達四萬人。當天部分罷工工人拉著橫幅遊行到高埗鎮政府，和警方發生衝突。自此開始，大罷工隨著網路擴散、媒體報導，已經一發不可收拾。

4 月 16 日，工人沒有上街遊行，但大批聚集在廠區實行「打卡停工」，廠區也充滿了各類員警，有特警攜帶警棍，也有警犬。國外媒

¹⁰ 春風張治儒在裕元罷工過程中，共發過 3 份公開信和 3 份聲明，公開信和聲明，是不同的內容；都是透過微博或 QQ 群發送。

體記者來訪，引起眾人圍觀。前一兩日遭員警打傷的工人，寫了大字報躺在地上申冤抗議。廠區的公布欄和牆上，出現的抗議海報寫著：「打倒台灣佬」、「打倒大陸走狗」、「台灣佬不把大陸人當人看」等字眼。17 日，英國廣播公司(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以下簡稱 BBC)、中央電視台（以下簡稱央視）英文網、*New York Times* 等海內外媒體，都跟進報導裕元的罷工。

4 月 17 日，廠方貼出罷工以來的第二份公告，主旨是澄清媒體和 QQ 群的工人質疑，並提及新方案：同意住房公積金以及社保的補繳、調升、提撥，預計 2015 年年底足額繳存。相較於 14 日的第一次方案，17 日的第二次方案具體提到了「依照政府規定依法補繳」，但關於基數調升和提撥，仍然是「預計 2015 年年底前足額繳存」。

17 日、18 日這幾天，罷工沒有緩和的跡象，反而因為 17 日廠方的第二份公告讓工人更不滿，QQ 上的訊息包括：18 日，老三廠有位員工的妻女，哭訴她丈夫昨晚被警方帶走，瞬間引起公憤，數千人的隊伍簇擁著母女兩人，湧向廠區行政中心，有人在遊行中與警方發生衝突。由於廠區範圍很大，道路空地面積也大，大批工人、員警、警車齊聚其中，非常熱鬧。¹¹

也是在 17 日這天，微博及 QQ 線上，流傳由「東莞裕元製造廠員工暨支持勞工維權的勞工界、社會各界人士」署名的邀請連署公開信，呼籲廣東省總工會，針對裕元違法、弄虛作假，必須具體回應，並呼籲由上級政府組成工作組，進入裕元，並組織工人進行代表選舉，要求總工會指導和協助裕元依法重新選舉工會委員會。¹²

4 月 18 日，裕元廠方張貼了東莞市人力資源局的文件，此文件答

11 罷工這幾天的照片，散見於網路上及 QQ 群中，例如 Grrr 的微博，整理收集了豐富的照片：Grrr 新浪微博 2014b（網址 <http://wickedonna2.tumblr.com/post/83123440287/4-18>，取用日期：2015 年 10 月 28 日）；新青年網頁 2014（網址 <http://www.youth-sparks.com/bbs/viewthread.php?tid=4086&page=1#pid21074>，取用日期：2015 年 10 月 28 日）。

12 〈裕元工友暨勞工界、社會各界人士呼籲廣東省總工會依法履行職責的連署公開信〉，詳見東莞裕元製造廠員工暨支持勞工維持權的勞工界、社會各界人士 2014（網址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oNetry0CZrkNntzjT5pJ5tJuhzlkBQ_jwaZ7RzshOpM/pub，取用日期：2015 年 10 月 28 日）。

覆裕元工人的訴求，文中說：「依照有關部門意見，不支持員工以公司未足額繳納社保為由解除勞動合同並要求經濟補償」，另外，員工原指控公司未替職工繳納住房公積金，因此要求解除勞動合同，但「法律沒有規定公司需要支付經濟補償」。此文件同時確認裕元的勞動合同是合法有效。這個遲來的政府文件，基本上幫廠方澄清解套。但大罷工已經 5 天了，覆水難收，雙方沒有任何交集。

4 月 18 日，深圳春風張治儒在 QQ 空間，發布第一封公開信，提醒工人要理性抗爭。建議工友們應該儘快「建立組織框架，成立領導團隊，選出工人代表，統一行動」，這封信在 QQ 群中，約四千餘人看到，而且被工人列印出來，在廠區內發放。

4 月 19 日，張治儒又組了另一個 QQ 新群「裕元鞋廠領袖孵化群」，有九十多名成員，採取邀請制，主要目的是選出工人代表，張治儒建議工人利用 20 日星期天，選出工人代表。

4 月 20 日下午到深夜，張治儒與 90 名工人通過 QQ 群舉行網路會議，也在 QQ 群發送另一份公開信，建議工人利用雙休日推選出工人代表（馬倩 2014）。

（三）罷工的落幕

4 月 21 日星期一，是本次大罷工的轉折點。從 14 日開始罷工以來，已經進入第二週。過去一週，國際買主（如 Nike、addidas）不斷給資方壓力，要求立刻復工。¹³ 原本地方政府不支持廠方全額回溯補繳社保及公積金，但隨著罷工時間拉長，地方政府也將此次事件由勞資爭議轉為維穩事件，必須儘快落幕。另外，在工人群眾這邊，也開始覺得罷工一週多了，沒勁了，動力開始消退中。¹⁴

21 日下午，廠方公告了第三套方案，再次保證資方會依法足額繳存工人的社保與住房公積金，並且馬上從 5 月 1 日開始實施（先前第二套方案是預計 2015 年年底足額繳存完畢）；關於補繳，工人個人

13 路經理訪談，2014 年 4 月。

14 田野訪談，賀陸幹、羅陸幹，2014 年 4 月。

也必須相應補繳自付額；另外，自 5 月 1 日起，每月發給員工生活津貼 230 元。這個方案，其實只有加發 230 元生活津貼稍稍有吸引力，工人們在 QQ 群上的主流意見仍是不願意補繳養老和住房公積金的自付額。

4 月 21 日晚上，張治儒和廣州勞維的陳海輝，在萬江一個偏遠餐廳見面，和六廠十餘名工人見面，討論選工人代表的方法，會議進行到晚上快十一時，並相約下次找到三十至四十名工人一起開會。¹⁵ 隔天早上張治儒被約到東莞公安部國內保衛局（以下簡稱國保）住宿的酒店，張被國保帶到廣州增城白水寨的風景區「被旅遊」，軟禁在一個 3 層樓 9 個房間的農家別墅，禁止對外聯繫。與此同時，QQ 群及微博傳出張治儒的夫人通報，張治儒出門說去見國保，但失聯未歸。他的助手林東也同時失聯。

4 月 24 日，市總工會發出〈復工倡議書〉，呼籲員工復工。市總工會指示下，廠方舉辦勞資見面會，讓企業工會委員向所有工人提出〈復工倡議書〉。24 日稍潭廠區除老三廠、加元一廠、YY3 模具廠外，其他工廠的生產線有復工，部分工廠的工人在廠裏靜坐，沒有開工。24 日當天，張治儒被深圳國保釋放回家。網路上的 QQ 群，也於此時被封鎖了。25 日，部分工人開始復工。同一天，中央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新聞發言人在新聞發布會上說，東莞裕元鞋廠確實存在未如實申報社保繳費的問題。26 日，大部分生產線，也回復生產。

四、集體行動的形成和動員

大罷工的形成和動員，就宏觀的結構面而言，可以歸納幾項因素的影響：(1) 工人對企業的疏離和不信任，對於自身勞動契約的憂慮和

15 關於 21 日晚上張治儒跟工人在萬江見面一事，我從張治儒訪談得到的第一手訊息，跟《亞洲週刊》的報導有所出入，《亞洲週刊》稱：「分批次與裕元一廠、新老三廠、六廠、八廠、加元廠的約五十多位工友會面，商討維權方案。」（馬倩 2014: 31），這與我和張治儒的訪談內容不符。

不信任。珠江三角洲工人目睹所處企業或區域內工廠，陸續遷往內地省分或東南亞，對於自己的職業生涯，開始產生不確定感和憂慮。近年來國際經濟低迷，出口訂單銳減，企業收入減少，但人事成本遽增，低工資逐年上漲，企業對工人的社保分攤，也與日俱增。在內外交迫之下，大部分企業不再擴廠，甚至減產、關廠歇業或內遷外移，工人對此莫不感到焦慮不安（鄭志鵬 2014）。(2) 工人對自身經濟狀況的不滿和壓力。近年來物價上漲，工時不增以致工資停滯，房租、醫療、教育等費用，讓農民工飽受壓力，金錢收入成為日常生活中的核心要素和壓力來源。貧富差距的來源是在社會主義時期就留下的地區差異和部門差異，並非單靠市場力量提高農民工收入就能平衡（Whyte 2014）。(3) 城鄉二元體制及農村發展落後之下，工人無法在制度上及認同上融入城市，也無法返鄉靠農業謀生。因此工人的流離感、挫折感、焦慮及不滿，隨著年齡增長，逐步提高。近年來，雖然政府積極提升農民的社會保障，但城鄉二元仍然涇渭分明，農民工在城市的醫療、教育、社保，無法與當地市民接軌，變成二等公民（吳介民 2011；林宗弘、曾惠君 2014）。如今第一代的農民工已進入五十歲左右的退休年齡，他們開始憂慮養老規畫，但在生活生計上，一方面無法融入城市，另一方面又無法返鄉重回農村生活，如此無解狀況下，只會越發挫折焦慮。(4) 即使法律明文保障的公民權利，例如社保、環保等待遇，地方政府的執法過程，也多偏向資方，選擇性執法。地方政府面對當地市民或外地農民工的集體抗爭，往往採取不同的對待模式，農民工的公民權，長期受到歧視和打壓。勞資爭議往往演變成工人和地方政府的對抗（Gallagher 2014；Lee 2007；鄭志鵬 2014）。

雖然面臨政經結構的劣勢，近年來也有幾項外在條件，有利於農民工的集體抗爭。(1) 農民工的權利意識上升，對於資方的違法行為，懂得質疑、投訴、抗爭。即使資方沒有違法，工人知道罷工是資方的痛處，尤其在趕工季節，往往能迅速取得資方的讓步。群體抗爭或罷工抗議，逐漸成為有效的維權手段。(2) 地方政府面對集體抗爭，比起

以往，採取更為容忍的應對政策。尤其面對外資企業的勞資爭議，只要群體抗爭不擴散到廠外的道路或影響公共秩序，一般廠內的靜坐、罷工，地方政府並不會進入廠區鎮壓。地方政府樂於擔任調停人或仲裁者。(3) 地方政府和大型企業之間的利益逐漸不一致，各有所圖。以往地方政府財政收入仰賴企業繳納的稅費，企業是地方政府的衣食父母。但近年來，地方政府從城市擴張、房地產開發，攫取更快速、更巨大的利益，已經看不上企業的稅費。在沿海省分，早年進駐的大型企業，坐擁大片土地增值效益，對地方政府而言，寧可它們早日遷移，騰出土地。且中央政府將地方維穩列為官員考核要項，也讓地方政府的行事邏輯，以維穩為出發點，必要時必須犧牲成長或利益。(4) 網路及手機的普及，讓工人彼此的資訊流通、訊息討論，克服了時間、空間、人數的限制，集體抗爭的組織成本降低，但抗爭收益卻很直接迅速。集體抗爭往往能在短時間內散布訊息，聚集群眾。

上述這些因素，是大罷工所處的結構環境和時空脈絡，但這些結構環境背景因素，其實普遍存在於當今中國沿海（尤其是廣東）各地的工業區企業。那麼，為何是 2014 年 4 月裕元工廠發生了歷時 10 天的大罷工，四萬餘名工人涉入？為何是裕元，不是別的工廠？為何能歷時這麼多天？罷工是如何開始、如何延續，又是如何結束？

在上述的結構環境和制度脈絡下，這次裕元罷工的產生和持續，關鍵在於行動者之間的互動，形塑了罷工的過程和後果。這些行動者主要包括工人、資方、政府、媒體等四方。具體而言，包括：(1) 工人和工人 NGO，工人群體內有積極行動者、參與者、旁觀者。工人們的動員和訴求，受到積極份子、NGO 組織者的影響。(2) 資方，資方除了台灣老闆及其高階幹部，另外也有在中國的台幹及陸幹；他們之間的互動，形塑了資方的行動力。(3) 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且涉及不同機構，如：社保局、勞動局、公安、國保、工會等。(4) 媒體及網站，包括傳統的境內和境外新聞媒體，如：中國新聞網（以下簡稱中新社）、中央電視台（以下簡稱央視）、人民日報、新華網及海外媒體；也包括 NGO 的網站、社交媒體，如微博和 QQ，它們的資

訊傳播，對於群眾動員和認知形成，有直接廣泛的影響。

工人的動員如何形成？如何持續？如以下本節所述，工人罷工的動員成功，導因於裕元廠區的生態環境、工人群體的人口結構及他們的社會連帶，這些特定因素架構了大罷工的土壤；這次罷工過程中，工人提出的權利訴求，社交媒體中的感性情緒渲染、引人憤恨的訊息，讓大規模群體行動從星星之火瞬間有燎原之勢。另一方面，資方及政府無法即時化解罷工，肇因於資方管理層反應遲鈍，低估工人的動員規模和持續能量，又無法有效化解疑慮和誤會。地方政府和資方的利益及誘因並不一致，以往地方政府和外資企業是利益共同體，共同攜手發展地方經濟，也共同剝削工人的利益。但面對這次大罷工，地方政府有自己的盤算，資方跟政府無法統一戰線。地方政府的利益和動機，如今已和資方分道揚鑣，它要考慮的，是政績表現、社會維穩，未必是保護資方利益。因此資方和地方政府面對罷工時，雖然有志一同，希望早日復工，但它們彼此的誘因和思量，各有所圖，有很大的差異。

具體而言，大罷工的動員和過程，來自以下幾個因素的交錯影響：

（一）生態環境為基礎的群眾動員

裕元工廠的廠區配置和人際關係，是大罷工在硬體和軟體上的溫床。大罷工所在的高埗裕元工業區，有 140 萬平方公尺的生產樓面面積，剛好佔了裕元在全中國生產樓面面積的一半。這樣的生產樓面面積，相當於 196 個標準足球場或 3,300 個籃球場的樓地板面積。¹⁶ 在東江邊畔的稍潭工業區，主要的廠房包括：老三廠（又稱 AB 棟）、新三廠和制一鞋廠，共約二至三萬名工人。例如，老三廠內兩棟車間大樓併立，各有 6 層，每層有 3 條生產線，共計有員工一萬四千多人。獨立封閉的廠區和生活區，是自成體系的小社會，除了棟棟相連

16 資料來自裕元公司網站。裕元工業（集團）有限公司，年代不詳（網址 <http://www.yueyuen.com/index.php/about-us-5/equipments>，取用日期：2015 年 10 月 28 日）。

的廠房，還有食堂、宿舍、超市、操場、幼稚園等設施。附近上江城工業區有六廠、七廠和八廠，約一萬餘名工人。廠區緊鄰高埗鎮區，員工若不是住在廠區宿舍，也在緊鄰的鎮區街屋租房，這些住宅樓多是本地人修建，約四、五層樓高，密密麻麻，形成龐大成片的農民工住宅區。樓下是店鋪小店，喧鬧的市集。當上下班時刻，工人蜂擁進出。上班時，數萬人在棟棟相連的樓層廠房車間內從事生產線作業，外邊的風吹草動，瞬間耳聞，立馬可以參與其中。如此的生態環境和空間配置，是大規模罷工或群體騷動的基本要件，裕元製鞋廠區已經具備。

數萬名工人的人口特質和人際關係，也影響了他們彼此的互動和連結，進而促成集體行動的可能性。裕元在 1990 年代時期，年輕農民工源源不絕，但晚近十年來，面臨勞動力短缺及電子廠的競爭，年輕力壯的工人大幅減少，工人以中年人為主，他們比年輕工人的流動性低，且夫妻檔、兄弟檔、老鄉們，非常普遍。部分第一代工人的工齡已接近二十年。在老三廠，工齡超過超過十年的工人達半數以上，大多數工人只要再繳納幾年的社保，就可累計繳納 15 年才能領取養老金的資格。裕元工人的年紀高、工齡長、流動低，因此他們會關心養老保險，反之大部分沿海地區大廠的工人，年紀輕、工齡短，常流動，他們不在乎養老保險，也期望能不交保險多點現金更好。

工人之間因為親屬、同鄉、宿舍、車間，形成密集的人際關係網絡；這些社會關係可能在一個空間並存，例如同一個廠或車間內，以常德幫為主，從廠長、課長、班長，都是同鄉關係。同鄉關係，也常存在於宿舍或住處，或休閒場所。但也可能車間及宿舍是區隔的人際關係，也可能交錯。¹⁷ 當今工人們人人使用手機的社交媒體（微信、QQ），他們的人際交流和網絡資源，可以超越空間的藩籬（汪建華 2011）。但就高埗裕元而言，相當多數的工人來自特定區域，例如湖

17 關於農民工的親屬、同鄉、車間關係，對於他們勞動體制及集體行動的影響，參見 Lee 1998; Peng 2011; 彭昉 2007; Chan and Pun 2009; Pun and Smith 2007。

南常德、湖北通山，所以同鄉關係是廠內社會關係的重要軸線。例如，在罷工期間，裕元廠方邀請了湖南常德市政府的秘書長、信訪局局長，協助說服廠內大批常德幫的幹部支持廠方。

製鞋業的生產流程，需要同班組、同條生產線的協調合作，工作獎金的計算也是以生產團隊（事業群、廠、車間、班組）為單位，班組長是生產過程的核心人物，他們監督帶領線上工人的勞動過程，也決定「團體件資」獎金的分配，猶如班長帶兵，必須感性理性都用上，軟硬兼施，以求取該班組的最大效益；因此工作場域的人際關係就很重要，也很密切。

工人下班以後，有的住廠區內的集體宿舍，樓高八、九層，沒有電梯，每間房有十到十六個床位，但近年來都沒住滿人，每間平均八人上下。幹部在廠區內也配有家眷宿舍。很多工人在緊鄰的鎮區街上租屋，也是如宿舍般的大群人集居。裕元近年來趕工加班越來越少，工時正常，工人在晚間及週末，多半在網上、手機上跟同鄉朋友交談，或相約打球、出遊，但基本上多數還是靠手機休閒交友。

舉例來說，裕元和富士康，是非常不同的生產體制和人際關係。2011年的富士康自殺潮，結構成因就是富士康嚴厲的勞動體制和疏離的人際關係（潘毅等 2011）。裕元和富士康，兩者都是獨立廠區、綿密廠房、密集生產線的數萬人大軍。但迥異的是，裕元工人的年紀較大、工齡較長、在廠內廠外有社會關係（親友、同鄉、同事），工作流程和待遇分配，也和社會關係有關。反觀富士康的工人大軍絕大部分是年輕人、工齡短；在生產流水線上，是孤立、單調、重複、密集的操作過程；在宿舍內，也是擁擠髒亂嚴密控制的生活環境，是碎片化的社會關係和原子化的個人，缺乏社會聯繫、沒有朋友。甚至資方主動將同鄉的工人分到不同的單位，以免成群結黨，卻也造成工人的更加孤立。（吳麗瑋 2012）另一方面，富士康的工資比裕元高了一截，足以吸引涉世未深、嚮往深圳的內地年輕人，但富士康的勞動強度要求更高，體力負荷更大，工作現場的規訓和壓力也極為嚴厲（Chan et al. 2013；Lin et al. Forthcoming；潘毅等 2015；楊友仁

2014)。¹⁸ 裕元工人在如此密集的生產空間及人際關係下，平常大家就是手機不離手，線上的 QQ、微信、微博，是人際溝通和訊息傳播的主要平台。可以想見，比諸於年輕工人，裕元工人的網路世界，更多的連結對象是廠內同鄉、同事、朋友，相對更多的議題是廠區和生活的共同議題。類似的比較，也見於富士康和南海本田，它們兩者都有高強度的勞動過程和相對低廉的工資，但南海本田的工人不像富士康一樣被徹底地原子化，南海本田保留了原有的各種社會關係，手機、QQ 群等現代通訊方式也為工人提供了經由虛擬社群走向實體社會行動的重要路徑，這也造成本田工人於 2010 年 5 月罕見的成功罷工（郭于華等 2011）。

（二）自發性罷工：無中心領導但有 NGO 指導

裕元廠區特有的生態環境和人際關係，成為醞釀大罷工的友善環境。但吹號角的領頭人在哪兒？大罷工有一條鞭領導的組織動員系統嗎？若沒有，它的組織動員模式為何？如何能讓數萬名工人跟著罷工近十天？從公開的訊息，如媒體報導、網站訊息，到作者個人的田野訪談，我們對於大罷工的領導及組織，可以歸納幾項確定及不確定的內容。我們可以確定的是，此次大罷工沒有公認、全面、持續的領導人物和組織系統，更不是開放社會中典型社會運動靠組織動員的集體行動，但它也並非無組織、無互動的群眾騷動。雖然沒有檯面上的領導人物，但幕後有一些積極份子，他們有的以自己的人际網絡作為影響範圍，有的在 QQ 群發訊息促進行動；但他們彼此多沒有形成橫向的連結，人們彼此的橫向連繫是建立在自己熟人圈內或匿名互動的網路群組（如 QQ 群和微博）。在罷工過程中，張治儒極力敦促工人們選出自己的代表，才能跟資方談判，也才能委託協力廠商，但自始至

18 關於富士康的工廠管理及工人生活，參見兩岸三地高校富士康調研組，2010，《富士康調查報告》系列二：〈富士康生產體制——規訓與懲罰的勞動集中營〉；系列三：〈生活空間——囚在富士康帝國〉。引自苦勞網（網址 <http://www.coolcloud.org.tw/node/55059>；<http://www.coolcloud.org.tw/node/55062>，取用日期：2015 年 10 月 28 日）。另也參見潘毅等 2011。

終，沒有任何積極份子願意具名，站到台前，成為工人代表。

外來的助力是勞工 NGO，他們是唯一在罷工過程具名的積極份子，關鍵份子春風社的張治儒。張治儒 4 月 10 日開始接觸裕元的抗爭，他花了好幾天掛在 QQ 群中，耐心解說，逐漸去除工人對他的疑慮，得到接受，然後他成為 QQ 群中的意見領袖。他在 QQ 上，引領話題，向工人介紹法律知識、政策背景及抗爭策略；極力敦促工人們選出自己的代表，才能跟資方談判，也才能委託第三者進行集體協商。但是，張治儒推動工人們自我組織起來，推派代表，自始至終沒有進展。張治儒試圖在 QQ 上跟工人用真實身份互動，但工人們仍然不願出示真名；他安排跟工人積極份子見面，最後在 21 日只見了六廠 6 位工人積極份子，但隔天就被國保招待去「旅遊」了。

大罷工的動員過程，猶如是一種「板塊冰河效應」；先是工人小群體 A（底廠工人）到政府部門去集體請願；與此同時，小群體 A 以外的不相干的 QQ 群版主 B（新三廠工人）開始在 QQ 散布訊息、號召親水公園的聚眾活動，當天又有另一小撮人 C 帶頭的堵橋行動，這 A、B、C 三群人，來自不同廠，彼此並沒有橫向互動，他們或有在 QQ 群上以化名存在，接受並傳播訊息。14 日罷工開始，不是 A、B、C 策劃發動的，跟他們無關，是其他廠和車間自發性發動。某個車間開始罷工，瞬間影響了隔壁及樓上樓下的車間，然後隔壁的廠房，然後這些眾人行動達到了其他工人們參與集體行動的門檻值 (threshold) (Granovetter 1978)，罷工就如滾雪球般形成了。此時原本小群體內的領導或動員機制，就轉移到網路 QQ 上的大群成員互動。

3 月中到 3 月 28 日的第一波集體抗爭，主要來自底廠員工，這是熟人網絡，由老員工帶頭，抗爭者受到人際圈中的重要他人（例如：上司、同鄉、同事）所影響。但是，3 月下旬起，工人們陸續在網路上組了 4、5 個 QQ 群，QQ 群的成員是化名，彼此未必認識對方，它超越了熟人社會，進入網路上的匿名社會。4 月 3 日起，網上開始有人召集親水公園聚眾，廠區也有人散發小紙條，寫著「4 月 5 號兩點半清水公園活動」，工人們手機也收到群發訊息。這些訊息源頭和組

織，其實已經脫離了底廠工人圈，來自其他群體工人。4 月 4 日，高埗公安通知裕元廠方，裕元工人約集了隔天要在親水公園聚會，廠方其實也已經知道這個訊息，從 3 月工人集體申訴起，廠方持續有人進入 QQ 群瞭解狀況。當時高埗公安希望廠方能阻止該聚眾活動，但因為當天是假日，工人本就會在外活動，無法管制。從 4 日凌晨開始，高埗公安鎖定 QQ 群中發布訊息的版主，告訴廠方此人的姓名，是一個新三廠的工人，要廠方找到他，但廠方發現他一週前搬家了，當天找不到人，後來大半夜透過各種人際關係，打了很多電話，終於在 5 日凌晨找到。他在凌晨四時多，「被找去公安局喝咖啡」，公安當場要他上網發布消息取消活動，於是這個版主在 5 日上午 6 時，發布取消親水公園活動的訊息。可是當下版上的工人群眾就非常不滿，大家號召不要理會版主。後來去到現場的人，很多人當天其實也沒有看到版主的公告，大家已經事先通知連絡好就去了。顯然這個版主並不是唯一的積極份子，5 日下午，親水公園現場聚集了一千多人，各廠都有，沒有什麼事兒發生，沒人拿大聲公，也沒人呼口號，也沒有橫幅。根據一位到現場的台幹描述，「工人們大家都很幹，現場沒人指揮，說要有記者來也沒有，裝肖維，就散了」，人潮開始慢慢散開了。忽然有人說，「走，來堵大橋」，剛好公安都集中在親水公園這一頭，沒公安顧大橋，一小撮十來人，就去把大橋路口堵了起來，人潮瞬間就聚集過去。

4 月 5 日的堵大橋是臨時起意，或事先已有策劃，至今不得而知。從當天公安國保的布陣及他們給廠方的資訊看來，公安國保事先毫不知情，他們始終以為工人就在清水公園聚眾而已。¹⁹ 公安國保的電信和網路偵測能力十分精良，如果積極份子們事先談論此事，他們一定有所掌握，也能布陣阻擋。所以，由此可以推斷，直到 4 月 5 日的堵橋行動，都還是侷限於小區塊內的人際組織動員。

14 日中午開始的罷工，事先在 QQ 群中並沒有正式預告，但是張

19 公安，指公安局警察。國保，指「國內安全保衛大隊」，屬於員警的一支。制度上負責政治偵防、情報收集等。

治儒在 13 日凌晨 QQ 群中發給工人的公開信中，寫道：「大部分工友還是非常的勇敢，明確表示如果 14 日工廠的答覆不滿意，就決定採取行動，開始停工，不管其他工友怎麼想。」這個訊息經過一天多在 QQ 群中轉發流傳。雖然 13 日張治儒約了 8 名工人積極份子見面失敗，但他們想必已經接收到 14 日停工抗議的意見。當晚張治儒主動連繫東莞警方去聊聊，直到 14 日上午 4 時，東莞警方將張治儒送上高速公路回深圳，此刻張治儒也不知道 14 日工人是否會罷工。

14 日當天，罷工先是由車間裏的幹部班組長發動，八廠、制一底廠、老三廠的工人，午休後進廠打完卡，就直接出來不上工了，中午打卡時，有人大喊：「罷工，要求加薪」，工人們在廠房外聚集，人潮開始集結，橫幅「還我社保、還我住房公積金」也已經準備好拉出來。根據現場工人描述，當時「有人在外面高喊著，罷工罷工，出來出來，加薪加薪，罷工要求加工資！」大家不論是看熱鬧或被老鄉朋友叫出去，就都停工跟著人群走出來。於是，人潮形成，越聚越多。

當天罷工的工人，有一些是被喊出去的，最早發生的是老三廠，看到三廠的不出來，跑到三廠門口去叫去喊、去罵，就喊出來了，然後就是八廠就開始動了，六廠看到八廠不做事了，六廠的也出來了，就是連動嘛！²⁰

14 日的大罷工場景，顯然不是臨時起意，積極份子事先有所準備，他們做了三面打字印刷的大橫幅布條，紅底白字，寫著：「還我社保、還我住房公積金」、「什麼叫退休，寶成退休一腳踢」、「嚴懲違法企業，維護法律尊嚴」，也張貼 A4 大小的訴求文字，這些都必須事先準備，也必須有後勤支援（打字、印刷、橫幅製作）。4 月 15 日，當網路上出現「蕭副協理汙辱大陸人」的訊息時，隔天一早廠區內就貼滿了仇台的 A4 海報，且版本多達 6 個，顯然背後有一小群

20 田野訪談，羅陸幹，2014 年 4 月。

人。

我在罷工結束後，在裕元廠區訪談裕元員工，問及罷工是否「幕後有組織策劃」？得到的答案都是否定的。一名低階陸幹說：「估計埋伏在裏面可能性不大，這個純粹就是鬧事；不是埋伏在裏面，它是積怨，一下子爆發了；老員工老幹部對公司那種積怨會爆發出來」。²¹

15 日起一連近十天的罷工，工人們的情緒高昂，形成了集體壓力，但在 QQ 群數百人上線的交談中，仍無法認定出是否有帶頭份子。張治儒那幾天都掛在 QQ 群上跟工人交談，他也試圖另開 QQ 空間，希望說服積極份子以真名互動，但始終沒有成功。直到 21 日晚上好不容易說服三廠和六廠的數名積極份子到萬江面對面討論，結果當天也只有三廠工人到場，且原本張治儒計劃利用此次聚會推動各廠自行推舉代表，但直到復工之前，都沒有成形。罷工後期，政府工會進入廠內舉辦幾次座談會，邀請檯面上的工會委員（多是中高階陸幹），他們是名義上的工人代表，甚至最後簽署〈復工倡議書〉，但廠內工會組織，其實跟罷工的發起和過程都沒有關連。裕元工會早在 1997 年就已經成立，但到了 2014 年初，僅有一千五百多名會員，會員只占員工總數 3%。據張治儒所述，他在 QQ 上實際交談的積極份子，曾有 3 到 4 位課長級幹部；還有 1 位是某廠的工會幹部，也有經理，但是後來這些積極份子也跟他失去了連繫。

雖然 QQ 群中沒有帶頭份子，但在群中有很強的內聚力；雖然是匿名，但成員會彼此詢問身份，甚至被要求報出工號，若被認為是資方派來臥底的，會被群起而攻，甚至被群主踢出 QQ 群。一位裕元行政中心的陸幹說：「只要我們噤聲不發表言論，他就把你踢出來；你一定要發表和他相近的那種反動的言論，和他一致就不踢你出來。甚至最後變成了他要你實名驗證啊，一定要驗證你這個人，他說不是漢奸才能進來。總公司的人更不能加。」²² 據張治儒所言，「寶成在群」

21 田野訪談，羅陸幹，2014 年 4 月。

22 田野訪談，沈經理，2014 年 4 月。本文作者的研究助理也進入工人的 QQ 群參與觀察，被詢問身份，她據實回答是來自台灣的研究生，得到歡迎，沒有被踢出 QQ 群。

的群主的網際網路協定位址（Internet Protocol Address, 以下簡稱 IP）在越南，管理員的 IP 在廣州，不在東莞，他們是裕元的離職員工，但不是現職工人。張治儒轉述群主曾言，裕元廠方曾來打過招呼，願拿出十到二十萬元，希望解散這群組。

總之，這場大罷工的組織動員，的確有積極份子扮演特定角色，例如：班組長發動自己車間的工人停工；高級主管消極抵制復工，不執行廠方指令、也不阻止停工或罷工；有單兵份子在網路或 QQ 空間上散發消息；也有人製作橫幅、製作傳單貼在廠內；也有工人在街上遊行時跟公安發生衝突，被拘留一天；也聽說有人被公安拘留 7 天之久。但這些積極份子並沒有現身、不知道他們是誰、他們彼此也不必聯合行動。他們各自影響了他們的人際網絡，但因為廠區內的生態環境和人際關係本就很緊密，原本互不連繫的區塊，因為人際關係、網路及 QQ 空間、密集生態空間，很快速就互相感染；再加上春風張治儒的鼓吹獻策及媒體大肆報導，大罷工像瘟疫般迅速擴散，且持續好幾天。

（三）公民權訴求

大罷工的目標和訴求，在理性和感性方面，都打動了多數工人，因此即使沒有系統性的指揮動員，單靠攫取人心的訊息，在人際網絡和 QQ 空間上流轉，就牢牢抓住每個人的理性盤算和情緒出口，牽引了群眾的行動。

低報社保養老金與缺繳住房公積金，是公開訴求的核心，這兩個訴求是資方及地方政府的罩門，當工人以「有無違法」直接質問資方和地方政府時，資方自認無辜，希望地方政府出面解釋，但地方政府認為資方沒有搞懂中國的政治潛規則，工人拿著中央政府的勞動法和社會保險法來質問，地方政府在分權體制下展現的靈活執政，可做不可說。地方政府惱怒資方應儘早化解工人的抗爭，不應該放著讓它擴散。但更關鍵的是，這兩個訴求，是搭配了「資方長期欺瞞員工、弄虛作假」的控訴在傳播；具體「事證」是：社保局列印的工人養老金

明細，注記了令人誤會的「臨時工」、企業繳交項目餘額數字為 0、以及工人為子女報名公立小學，交上去的家長勞動合同被誤認無效等等。這些「具體事證」，讓長期相信「這麼大的廠不會騙我們」的裕元勞工對公司的信心瞬間破滅，工人們充滿了被欺騙、被踐踏的認知和情緒，這些消息和情緒，快速散播瀰漫。以 3 月 28 日的工人聚眾為例，當資方及地方政府試圖解釋「臨時工」、「無效合同」、「資方繳納為 0」都是誤會、誤傳，工人們真的是不相信，他們不要聽，他們認為他們被騙了，且他們看到官方列印的養老金明細，明明就支持了他們的認知；而東莞市社保局針對上述誤會的文字聲明，廠方貼出去，又被工人撕下來。他們認為政府和資方常年欺騙勞工，朝令夕改，他們被騙也不是第一次，尤其連大公司也跟地方政府一樣騙人，令人氣結，工人們在 QQ 空間的心聲是，「想不到裕元這種大公司，也會欺騙工人！」

社保養老和住房的訴求，對所有工人都有致命吸引力，上至廠長課長，下至生產線工人；既是權利之爭，也是收入之爭。養老和住房，本就是工人們鬱積在內心深處的長期壓力，體現了農民工和市民最顯著的公民權差別待遇；它們提醒了工人們的權利被踐踏，也刺痛他們低工資收入的現實。這兩個訴求，具有合法性和正當性，對媒體也特別有吸引力，不少評論者據此指出，中國勞工抗爭，進入了權利覺醒的新階段。

但是，「現金補償」才是工人們最在意、最真實的訴求。以往外資企業的罷工，工人大多以工資為其訴求的焦點，這次大罷工也不例外；現金落袋才是重點（陳敬慈 2012）。尤其對中年以下的工人而言，雖然養老和住房公積金，是未來可期待的經濟收入，但畢竟不如馬上加工資或得到補償金。一位陸幹描述了六廠、八廠的罷工場景：

像六廠八廠不知道怎麼回事啊，剛開始不知道社保的事情，然後突然有員工在喊罷工哦，加薪哦，工人一下子全跑出去了，罷工就是這麼起來的。員工因為以前為了加薪也是用罷

工的方法來解決，所以大家很習慣了；只要說加薪他們就很願意加入罷工。²³

大罷工過程中，工人們除了社保養老和住房公積金以外，也要求調漲工資，且社保、公積金的過往自付額應由工廠全額補繳。他們也以公司未足額繳納社保為由，要求解除勞動合同並得到經濟補償。因為既往很多勞資爭議，多源於員工要求公司支付補償金以買斷工齡，也常有工人罷工要求加工資，且成功達到目的。工人們認為有例可循，不妨一試；寧可多拿幾個月的工資，然後找別的工作。這幾個經濟性訴求，是罷工初期工人們的主要動機和普遍期待，它們特別具有普遍性的感染力。

（四）情感動員

此外，工人的經濟性訴求，又搭載了「怨恨」的情緒訴求，幾條「謠言」的傳播速度和殺傷力超乎控制，造成罷工動員的加成效果。在感性層次上，工人們的情緒被鼓動成台灣老闆欺凌大陸勞工的敵我矛盾和民族主義情緒。階級矛盾和民族主義情結，是中國人民在共黨教育下的意識型態，它們是中國人「怨恨」的來源（汪宏倫 2013）。在這次罷工動員過程中，它們被成功地喚醒，成為動員過程中最重要的助燃劑。我們分析罷工期間 QQ 群中工人的對話，出現頻率最高的詞彙是帶著民族主義的仇台言論，工人們以「台灣佬、台灣狗、台狗、台巴子」等字眼，指涉資方和台幹，工人們共同認為他們被台灣老闆「欺騙」、「羞辱」、「敷衍」，因此在 QQ 及廠區海報上的字眼是「打倒台灣佬」、「台灣佬不把大陸人當人看」。而站在資方同一邊的陸幹，在敵我對抗中，工人的話語就將他們指涉為「漢奸」、「工賊」，「走狗」。最後，「資產階級」、「革命」等階級矛盾的

23 田野訪談，羅陸幹，2014 年 4 月。

語彙也是經常出現。²⁴ 這些「革命話語」，代表既有文化對抗爭者的作用，可能源自三個機制：利益和策略運用、價值和意識型態、以及習慣及本能（趙鼎新 2007b: 272）。就實際現象而言，NGO 和積極份子，並沒有以「反台」的民族主義動員工人抗爭台灣老闆，更沒有刻意將陸幹標籤為「漢奸」；而「反台」的民族主義和「漢奸、走狗」的敵我矛盾，也不大像是當今工人的意識型態。因此，在這場自發性高、組織性差的罷工行動中，工人們運用的符號，多是依據他們長期養成的習慣和本能。被台灣老闆欺騙、被幹部欺壓，如此的情感動員，深深打動了罷工的工人們，因為它們符合了工人腦中既存的結構性解讀模式，這也體現威權體制社會文化的沉積。

公認最有殺傷力和動員效果的，則是傳言台籍蕭副協理說大陸工人「犯賤，罷不了三天自己就會回來做事」。當天這個傳言發生時，廠方要求目擊者挺身而出舉證，或者拿出錄音檔，但沒人可舉證，卻還是無法釐清此為空穴來風。甚至罷工結束一個月之後，工人們對此傳言多仍深信不疑。其他傳言包括廠方的廠房租約即將到期，到期後工廠就會關閉，這是為何廠方拖延處理，不願意立即補償。另外，4 月 22 日網上出現東莞石碣台達電子廠也罷工的訊息。這些訊息，很多迅即被媒體報導或轉載，更增添了資方或政府澄清誤會的困難度。即使是「誤會」或不實的「謠言」，傳布快又廣，它們是否真實已經不重要，重要的是工人們多深信不疑，成為激發他們持續罷工的重要動力元素。例如，一個工人網友在微博上的留言：

面對這次維權活動和罷工，我個人而言，我寧願自己永遠被欺騙。但是，我現在改變觀點，當看到三廠最高領導蕭副協理的話，他說：「大陸人，犯賤，最多罷三天就會乖乖回公

24 本文作者收集了 4 月、5 月裕元工人最常參與的「東莞裕元鞋廠 1」的 QQ 群聊對話紀錄，4 月 8 日到 5 月 7 日之間；共一百五十萬餘字數。統計分析得到幾個最常出現的詞彙的次數，如：台灣佬（200 次）、台灣狗（46 次）、台狗（61 次）、台巴子（111 次）、漢奸（1038 次）、工賊（525 次）、走狗（237 次）。

司上司上班，就當給他們放三天假。」我想反問，是誰逼大陸人犯賤，我犯賤比你們勾結政府違法，是誰輕誰重。²⁵

工人們接受各種訊息，來自人際關係、QQ 群、公司布告，若訊息之間有所出入，他們相信誰呢？長年的經驗使他們懷疑政府、資方、卻比較信任媒體、學者。例如，北京人民大學的王江松教授在微博中直言，裕元「在員工社保中採用弄虛作假的方式。有員工發現工廠只繳納了每個工人個人應繳納金額，而逃避企業應該繳納的部分。」²⁶ 這位學者的微博發言也被網站及媒體（如：德國之聲）轉載，造成真實的印象。裕元的台籍經理人說，4 月 5 日堵橋事件之後，高埗公安局拿了一份布告到裕元，布告內容是說集會遊行若圍橋堵路，是非法行為，會依法究辦。台籍經理人說：

公安局叫我去廠區貼布告，隔天開始有工人就出來說那個公安局布告是假的，是行政中心自己去做的，來嚇唬我們的，我們不要理他。我們貼公司的澄清公告，員工就不相信，甚至說社保局、人資局貼的公告，都是在配合企業演出，大家不要信。所以有些人看到公告，就當場就撕了。²⁷

（五）資方的失敗回應

面對工人的集體抗爭，裕元資方的反應速度和反制能力，可說完全失敗。早在 3 月中大批工人到地方政府立案申訴，3 月 28 日第一波廠內聚眾抗議，4 月 5 日清水公園聚眾、堵住高埗大橋，直到 4 月 14 日大罷工爆發。這其間有近一個月的時間，資方沒有具體回應，等於

25 Grrr 新浪微博 2014a（網址 <http://wickedonna2.tumblr.com/post/82954619400/4-16>，取用日期：2014 年 10 月 1 日）。

26 德國之聲，2014，〈珠三角危機：東莞裕元鞋廠爆發大罷工〉，4 月 16 日（網址 <http://www.dw.de/%E7%8F%A0%E4%B8%89%E8%A7%92%E5%8D%B1%E6%9C%BA%E4%B8%9C%E8%8E%9E%E8%A3%95%E5%85%83%E9%9E%8B%E5%8E%82%E7%88%86%E5%8F%91%E5%A4%A7%E7%BD%A2%E5%B7%A5/a-17572723>，取用日期：2014 年 4 月 16 日）。

27 路協理訪談 2014 年 4 月。

是沒有任何危機處理。很多工人說原先根本不知道 4 月 5 日的堵橋事件，是過了兩、三天才知道。2011 年 11 月，裕元黃江廠也發生大罷工，海內外媒體也大幅報導。但該事件在一週內就落幕平息，這次大罷工之後又拖了 10 天，若廠方及早反應，當不至於演變到後來 14 日的全廠區連鎖罷工。

3 月中下旬這段期間，面臨一百多人到社保局和公積金管理中心投訴的情勢，資方陷入猶豫兩難，顯然地方政府不願意出面說明，也不願意分攤責任。對於如何因應，台灣總公司缺乏明快回覆處理的原則，也沒有授權高埤廠方直接處理，就這樣懸宕著。在這次事件中，老闆及高階經理人，被陸幹及台幹們說，他們「沒接上地氣」，意思就是完全不瞭解下面發生什麼事情。從 3 月中到 4 月初屢次事件，裕元資方仍然沒有警覺事態會擴大到難以收拾。台灣總公司負責人力資源的最高主管，直到 14 日大罷工之後，才親自來到高埤現場瞭解狀況。

裕元行政中心的一名台籍主管表示，公司上層對於社保問題如何應對，拿不定主意；加上地方政府罷工剛開始時，不支持公司大幅度一步到位補繳社保養老金，裕元一直在跟地方政府協商。一位人資業務的陸幹談起 3 月中旬，一百餘名員工到社保局及公積金中心立案投訴，但是上級卻遲遲沒有明快處理，他說：

現在我們二代上來之後，台灣的組織就加大。所有的事情都很難報告上去。3 月的時候，這個事情當時剛開始有員工在社保局投訴的時候，我都已經很著急了，我就打電話問我上面的經理，我說：經理這個事情你們還不處理的話，後果就不堪設想。但經理也做不了主，反正我已經很著急了。²⁸

28 田野訪談，沈經理，2014 年 4 月。

我們現在，襄理跟經理講，經理跟協理講，協理跟副總講，副總跟還不一定見得到 Peggy（按：執行長蔡佩君的英文名字），然後是 7 人小組，7 人小組由負責這方面勞安的，再去跟 Peggy 講，Peggy 可能還要跟總裁講，就是說一隻蒼蠅，一隻蚊子咬到一隻恐龍的尾巴，大概一個月後，頭才會反應。²⁹

裕元資方對於工人抗爭的思路，陸幹們多認為搞錯了方向，事倍功半。台灣資方以為必須解決社保、公積金的補繳問題，但補繳金額是天文數字。實際上，雖然工人們以社保及公積金為訴求，他們關心的是立即可得的現金補償。裕元的中低階陸幹異口同聲認為，若是 4 月 5 日前後，直接回應集體投訴的工人，公司願意對他們的要求接受照辦，甚至買斷工齡加倍補償，那可能就沒事了。即使其他工人群起效尤，要求比照辦理，但至少公司可以拖一陣子，慢慢研究。或者，更積極有效的方案，就是一律加發工資，即能迅速滅火而不至於燎原。裕元第三份公告之後，復工陸續展開，看起來是因為廠方允諾自 5 月 1 日起補繳社保及公積金，但加發 230 元的津貼，是工人認為最實惠的誘因。³⁰

組織改造的目的之一，在於進一步提升生產效率，尤其近年來中國勞動力吃緊、工資急速上升，勞力密集產業更急於擠出微薄的利潤。裕元也在接單生產的各個環節，努力提升利潤及效率，其結果就是大家的壓力指數更加上升，幹部和生產線工人的關係，更加緊張。據裕元工人轉述：

在鞋廠和底廠，幹部有時會責罵員工。因為台灣佬拼命的壓縮工時，增加產量，所以幹部和員工的壓力都很大，以前 10 個小時能做出來的，現在要求 8 小時完成，幹部只能緊催員

29 田野訪談，許先生，2014 年 4 月。

30 田野訪談，沈經理；羅陸幹，2014 年 4 月。

工。」³¹

工廠流水線上面的流程，都是專人拿碼錶測過的，哪一個動作要幾秒鐘都是算好了的，照這個標準來定產量。測時間是細分到每個動作。流程標準化是裕元的一個重要標誌，但容易導致關係緊張。³²

寶成裕元的組織架構變更，不僅影響決策流程和資訊流通，也撼動組織內部的幹部心態，從而影響幹部的行為模式。一個陸幹說：「最近一、兩年，內地省分，開一個廠、關一個廠，就很無情的把這些幹部好像遣散一樣趕走。看到台灣老闆這樣對待陸幹和台灣人（按：指台灣駐地高階主管被退休或被調職），我們都寒心了。」³³

在這次罷工過程中，工人們的民族主義和階級矛盾的論述，對陸幹們造成很大的心理壓力。主觀上，他們不願意被戴上「漢奸、工賊」的標籤；客觀上，台灣高階主管們，又不信任他們的忠誠度，這對陸幹更造成傷害。一位曾經在裕元任職協理的前台幹直言：「這種罷工，就是要讓陸幹出面去擺平，你叫牛協理（按：陸幹）去搞定，他憑他的湖南老鄉關係，就能幫你搞定。」³⁴ 一位陸幹襄理對於公司的處理方式，感到憂心無奈：

雖然我對寶成是忠心，但是我們的感覺，出了這個事情之後公司首先就把我們一群人就推到對立面，就認為我們也是和他們這群是一起的，而且他們的一些政策也不想讓我們知道，生怕我們洩露。我們層級太低，我們只是著急，我們的

31 工評社，2014，〈與裕元一位老工人的深度訪談〉，4月27日（網址 http://blog.sina.com.cn/s/blog_ed2baf420101wdoo.html，取用日期：2015年10月28日）。

32 同上。

33 田野訪談，羅陸幹、賀陸幹，2014年4月。

34 田野訪談，許先生，2014年4月。

任何話也講不到上面去。³⁵

裕元行政中心的台籍路協理是此次罷工現場的主要協調人，罷工剛開始時，他面對面跟工人答覆問題，也跟公安及地方政府協調，他提到有些陸幹，罷工過程中，仍帶頭上班，直接加入生產線工作，以身作則，帶動工人；但也有陸幹們在罷工中，不願意為資方辯護。他說：

罷工開始以後，有幾個女廠長是嚇得要命。陸幹她的那個驚恐的感覺，你看得出來她的眼神。是真的有人被恐嚇。也有工人平常被幹部欺負，有的就是要來趁這個機會報冤仇。過去裕元的群體事件，都跟陸幹有關，你說這次陸幹有沒有在後面操控，我不知道，但講坦白，他不作為也是一種操控啊。尤其罷工剛開始時謠傳說可以折算現金，誰不要啊。今天我陸幹可以幫你召集工人，幫你 call 人回來上班；但他跟你說他不敢，因為他出去會被工人打，被罵工賊，你也不知道他是真不敢還是藉勢說說，他出去有沒有去幫你 call，可能五個說有的，只有兩個真的有去做。³⁶

寶成集團的跨海峽政商關係，在江澤民時代達到高峰，它曾捐贈北京清華大學一棟裕元樓，是該校 2002 至 2003 年度基本建設重點工程。這次事件，寶成也嘗試透過它的高層政商關係，由上而下影響地方政府，但在罷工第一週時，結果卻不如其所願。直到 4 月 21 日，寶成集團的執行長蔡佩君，才得以跟東莞市委書記碰面，在此之前，都沒辦法約成。當天會面之後，東莞市政府一改先前消極態度，願意積極協助處理寶成的復工。復工的布局，也是靠政府的精心操作，靠公安國保控制了張治儒，然後靠共產黨工會，指揮黨員工人們。

35 田野訪談，沈經理，2014 年 4 月。

36 田野訪談，路經理，2014 年 4 月。

（六）國家的回應

大罷工的發生和持續，其中最重要的影響因素之一就是政府的角色。政府在社保議題的政策立場、對集體抗爭的容忍程度，及勞資糾紛的處理模式等三個面向，都發揮了主導性的影響。除了社保、公積金的主管部門，面對大罷工，政府的另兩隻手是使用國家暴力的警察和國保，另一隻手是披著工人保護者外衣的政府工會。

就社保和養老金議題而言，雖然法理上是企業的責任，但其實是地方政府和企業合謀的結果，地方政府針對不同類型的企業，有相應的社保和公積金繳交要求，如覆蓋率、工資基數等。此次裕元勞資爭議的「低報社保基數、未繳住房公積金」，其實是東莞地方政府認可的行為，且是東莞地區普遍的現象，甚至更多的企業沒有做到裕元的標準。東莞市政府的政令宣導，白紙黑字寫明「企業可先為中高層管理人員和技術骨幹人員繳存，再逐步向一般員工普及。這種擴面思路已經得到了國家住房與城鄉建設部的肯定。」³⁷

從 3 月中旬社保局接到裕元勞工集體投訴以後，裕元向總公司請示，總公司傾向於拉高基數，盡量回應員工訴求。但直到 14 日大罷工以前，地方政府並不支持裕元的方案，據一位裕元行政中心的人資幹部說：

實際上政府社保部門一直不同意我們補社保，一直要壓著我們，說：你們不能夠鬆口補社保，不能夠鬆口。最後我們老

37 東莞市政府 2010 年發布的紅頭文件〈市政府工作會議記要〉，記載了外商聯絡小組協調會上，關於企業為員工繳存住房公積金，市政府申明「考慮到企業的經營壓力，我市近年來一直按照多策並舉、穩步推進的擴面思路，堅持「低門檻進入、逐步提高」的穩步擴面策略，先選擇規模大、效益好、誠信度高的企業重點宣傳動員開戶繳存，且企業可先為中高層管理人員和技術骨幹人員繳存，再逐步向一般員工普及。這種擴面思路已經得到了國家住房與城鄉建設部的肯定。考慮到當前的經濟形勢下部分企業確有困難，對照「東莞市住房公積金繳存管理辦法」，有困難的企業可以緩繳住房公積金，但企業財務狀況好轉後要補繳」（東莞市人民政府辦公室，2010，〈市政府工作會議紀要〉[2010] 102 號，8 月 14 日。取自〈網址 http://www.chinadmd.com/file/zxrevvxtpzpsc3ecprwoat3r_1.html，取用日期：2015 年 10 月 28 日）。同樣的文字內容，也出現在東莞市商務局 2011 官方網頁上，關於三資企業的常見問題解答（網址 <http://www.dgbofec.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wjj/s31338/201201/461307.htm>，取用日期：2015 年 10 月 28 日）。

闆說補啊，然後就是因為副市長就在我們工廠，那幾天都在工廠，副市長的意思是怕影響到其他的企業。但後來不補罷工就無法收拾啊，後來我們老闆還是要補，政府就說那也就沒辦法，就補吧。剛開始政府是說你們儘量的能不補就不補。³⁸

裕元在 4 月 14 日發布的第一波方案，是跟地方政府協調出的結果，得到地方政府的認可，按照層級分為 7 個投保級別繳交社保養老金，預計 2015 年底前，完成全員足額投保。該方案完全不被工人接受，也得不到媒體或社會認可，但裕元啞巴吃黃連，當工人及外界質疑時，裕元不能叫大家去問政府。

地方政府在大罷工剛開始時，將此事件定位為「勞資爭議」，不願意介入替資方背書，直到罷工一週之後，4 月 16 日起連續幾天，海內外重量級媒體，如央視英語網、BBC、人民日報海外版，大量報導工人罷工爭社保，4 月 19 日的新華社報導，將裕元大罷工歸因於資方對工人社保、公積金的歷史欠賬，且未能早發現的原因，在於「東莞多個部門，監管確實存在不足」³⁹。從這幾天起，局勢急轉直下，地方政府也將此事件改定性為社會治安的維穩事件，積極介入。4 月 19 日週六晚上十一時多，高埗鎮常務副書記親自來到裕元行政中心跟台灣來的人資長會面，傳達政府的指示，要求裕元「立即合法」。⁴⁰

21 日裕元提出的第三套方案的公告內容，草擬過程中進出高埗鎮政府兩三次，被鎮政府一修再修，力圖在文字上能站得住腳，例如，「依法補繳」就是政府修辭的結果。⁴¹ 同時，政府的工會系統及公安國保，也積極展開作為。21 日，省總工會正式邀請裕元工會委員舉辦

38 田野訪談，沈陸幹，2014 年 4 月。

39 新華社，2014，〈東莞「代工廠」勞資糾紛引發風波〉，4 月 19 日（網址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www.gd.xinhuanet.com/newscenter/2014-04/19/c_1110315118.htm，取用日期：2015 年 10 月 28 日）。

40 田野訪談，路經理、沈經理，2014 年 4 月。

41 田野訪談，路經理，2014 年 4 月。

會議；22 日上午，東莞國保將張治儒帶到廣州旅遊軟禁。

公安國保部門，是地方政府處理罷工的另一隻手，從 4 月 5 日堵橋事件以後，4 月 14 日開始大罷工，直到 21 日，公安情治系統的強勢能力，並沒有如以往般直接介入遏止大罷工的蔓延。公安國保的部分行為模式，裕元資方和春風張治儒都表示不解。針對 4 月 5 日的清水公園聚眾，公安國保事先從網路偵測得知工人們要召集此行動，當即展現典型的強勢作為：要裕元把人找出來，大半夜把該版主找去喝咖啡，要其上網取消活動。然後調派大批警力到清水公園戒備，可惜百密一疏，沒有料到一小撮人就把橋給堵了。

4 月 5 日堵橋事件之後，裕元廠方也在 QQ 群中，察覺工人們越發積極討論社保和公積金的話題。4 月 12 日，張治儒進入 QQ 群，裕元廠方的台籍經理立刻去跟東莞警方商量：⁴²

4 月 12 號，我開始發現 QQ 出現張治儒。他介紹他的豐功偉業。我說糟糕了！這個人進來，他開始在上面拉賽（按：攪屎，亦即搗亂）。我那一天就很緊張！我馬上打電話給蔡協理，我說這個是非同小可，馬上找政府。因為開始有外力進來。那天晚上我到公安局，公安說：「張治儒！我們已經注意他三年了！」

其實我從 4 月 5 號之後，只要跟政府開會，我就提出網路 QQ 的議題，問公安他們：「可以把這個 QQ 關掉啊」，然後他們就說：「這個我們也是要看啦」，他就不正面回答你。我跟政府說：「你們要注意喔，張治儒已經嗆聲要把你們的工會翻掉，要給你們另外選」，這招他們有聽進去。

當張治儒他們在工人中分組，六廠 1 個組，八廠 1 個組，他們開始要用更系統化去溝通這些人，然後從大概在 17、18 號之後，張治儒他們已經開始說要選代表，我那時候就跟公司

42 田野訪談，路協理，2014 年 4 月。

內部高層說：「這個事情共產黨一定會出手，即使時間點我們不知道」。

深圳和東莞的公安國保人員，長期監控春風張治儒的行動。在這次事件過程中，先是 13 日攔截張治儒企圖和工人的第一次見面，14 日晚上要求張治儒發表聲明退出活動，張爲了應付又不失原則，咬文嚼字地發了聲明：「待工友們回歸理性和依法維權後，我們再考慮是否恢復與工友們的聯繫。」但從 14 日到 22 日凌晨爲止，張的言論和行動，沒有受到任何控制，張治儒在 QQ 及網路上，高調地指導工人提出新訴求、鼓勵工人選舉代表，也大肆批評資方沒有誠意，要工人小心不要上當。張治儒自己都納悶，爲何公安國保不僅可以容忍他這麼長的時間，也沒有對網路交談有任何干預：

其實我們自己都覺得很奇怪，以前搞這個，都搞沒幾天就被
人擋起來，QQ 群或微博就被封了。但這次很奇怪，4 號到
24 號，搞到 24 號才被封。⁴³

裕元廠方對於這次地方政府的回應感到挫折與無奈，對公安國保的行爲模式更感到不解。廠方長期以來，都很注意工人們參與 QQ 群的言論和民情。QQ、微博、微信，在罷工中，發揮了強大的串聯威力。但直到 24 日以前，裕元資方屢次商請公安國保，像以前一樣，將這些 QQ 群封鎖，公安國保都推說於法無據，不願意提前行動。對寶成這種跨海峽大財團而言，此次無法影響地方政府的職能部門，顯然不符合他們的經驗，這表示寶成在中國的政治關係和活動力，已經是今不如昔，也顯示地方政府的行動理性，不同於以往從地方政商利益爲出發點的考量而有所改變。

除了大批警察進駐廠區，東莞市總工會也開始進入廠內，在 17 日

43 田野訪談，張治儒，2014 年 4 月。

至 19 日之間，市及鎮工會的官員，開始在裕元行政中心跟裕元的工會幹部座談，這些剛開始的座談只有政府工會和裕元工會成員參加，資方並沒有參與，裕元工會幹部，多是資深工人幹部，沒有基層員工。⁴⁴ 裕元工會委員的成員主要是基層黨員工人幹部，其實就是工人黨員小組的另一個招牌。座談中，企業幹部提出的訴求除了補繳社保以外，更包括調漲工資，社保、公積金由工廠全額補繳等。

21 日，省總工會正式邀請裕元的工會委員，在廠區行政中心舉行會議，但這次會議中，工人幹部仍對廠方砲聲隆隆，提出的訴求仍多是張治儒在網上建議的意見，甚至有人提議要重選工會代表。同一天，21 日下午 5 時，省總工會的微博網站，刊載對 4 月 17 日勞工界、社會各界人士對省總工會公開信的積極回應，稱已派工作組介入，而且將組織職工選代表與企業集體協商。省總工會透過裕元工會及廠方，在廠區內散發〈東莞市總工會致裕元寶成公司全體員工的一封信〉及〈建議徵求表〉，公開信上說：「旗幟鮮明地支持各位工友合法的訴求」，並將上述微博網站的內容，大體又說了一次。省工會也發下建議徵求表，讓工人填寫收回。

4 月 22、23 日，政府工會約集了裕元工會委員開了幾次黨員會議，統一了口徑。4 月 24 日，市總工會發出〈復工倡議書〉，呼籲員工復工。在市總工會的指示下，廠方舉辦勞資見面會，讓企業工會委員向所有工人提出復工倡議書，過去強烈反對資方的工會委員會成員都不在現場。24 日除老三廠、加元一廠、YY3 模具廠外，其他工廠的生產線有復工，部分工廠的工人在廠裏靜坐，沒有開工。24 日當天，張治儒被深圳國保釋放回家。網路上的 QQ 群，也於此時被封鎖。25 日，部分工人開始復工；26 日，大部分生產線，也恢復生產。廠方開始進行繁複的行政作業，接洽銀行為工人開立住房公積金帳戶，並開始接受工人自願補繳社保自付額及公積金，廠方也依約進行補繳。

44 中國的工會，是各級政府的機構之一，由官員兼任工會主席並督導業務。例如，2014 年，廣東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黃業斌，是省總工會主席；東莞市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郭水，是市總工會主席。

五、討論和結論

本文所述的經驗現象，與近年來中國急遽增多的集體抗議事件相比較，有幾點值得注意之處。當今中國的集體抗議，抗爭者多採取非威脅性的策略，爭取物質利益，並侷限在自己的地域；政府對於集體抗爭，並非完全打壓，有時反而會容忍甚至促成 (Chen 2012; Cai 2010; Su and He 2010)。以外資企業的工人罷工而言，大部分是自發性、歷時短、工資議題、以雇主為抗議目標，手段非暴力、也多未引起警察拘捕抗議者 (Chen 2013)。工人集體抗爭，在規模、手段、組織、官方反應等各面向，並沒有固定唯一的模式，反而展現相當的多樣性。雖然工人在勞資爭議中常常處於不利地位，但從 2008 年以來，他們在勞資爭議中更加積極主動，利用有利於工人的政治氣氛，爭取權益 (Elfstrom and Kuruvilla 2014)；工人和雇主的集體談判，也出現過成功案例，例如 2011 年深圳冠星公司的工資集體談判（中國工人編輯部 2012）；工人也有持續抗爭始終不放棄的堅持案例，如 2010 年起的廣州恆寶工人一連串的維權抗爭行動（中國集體談判論壇 2012）。

2010 年 5 月，1800 名工人參與的南海本田罷工事件，歷時 17 天，轟動海內外，是指標性事件，工人爭取得到具體成果，集體協商加發工資，並且民主重選工會（Chen and Tang 2013；Chan and Hui 2012；Chan and Siu 2012；Friedman 2014；汪建華、石文博 2014；東風編輯部 2014）。裕元的大罷工，距離本田罷工已是 4 年之後，雖然本田展現了集體協商和民主工會的雛形，但就此兩點，裕元大罷工都沒有發生。究其因，裕元罷工涵蓋了四萬餘名工人，規模遠高過 1,800 名罷工的本田。本田的工人同質性高，一千八百多名員工中有七、八成是技校未畢業的實習生，有不少人來自二、三線城市，他們不自認為是「農民工」，反而自認為是「工人」（孟春 2010）。因此，相較而言，就組織工會的凝聚力、共識及可行性，裕元比本田更困難。裕元廠內工會在罷工過程中，毫無角色。雖然有 NGO 春風的鼓吹協助，

但工人不願意挺身而出促成工人代表選舉，甚至工人除了熟人圈以外，僅在網上 QQ 匿名交流，不願意以真名在網上與陌生人交流，在罷工最後階段，僅少數幾名工人願意與張治儒會面。⁴⁵ 裕元罷工沒有經歷集體協商談判，也沒有看到企業工會扮演任何角色，最後是靠黨政系統的政府工會由上而下進入廠內，直接進行復工協調。就後續影響而言，裕元的罷工議題訴諸於普遍性的工人權利，亦即東莞（甚至廣東）的社保養老及住房公積金制度，很可能當地企業，尤其大規模企業，最後必須以裕元模式為標竿，提高社保基數、給付住房公積金。如此的影響層面，既深且廣。

比諸於製鞋大廠裕元，台資電子龍頭富士康，近年來見諸報端的罷工和騷動，更為常見。在 2012 至 2013 兩年間，富士康被媒體報導的罷工或集體騷動，至少就有 16 件之多，分布於富士康在中國各個廠區，包括：深圳、武漢、太原、北京、鄭州、成都、佛山、宜春、昆山、東莞、煙台、蘇州等。舉例而言，2012 年 9 月 23 日，山西太原的富士康廠區，因為保安圍毆員工，約兩千名員工參與群毆保安，導致騷動，16 輛警車被砸，傷亡人數達三十餘人，衝突持續兩天。⁴⁶ 隔了一個月，2012 年 10 月 6 日，河南鄭州富士康三、四千人罷工，廠區內的大巴士車窗被砸，工人們聚集在廠區周邊的道路上。

⁴⁷ 2013 年 1 月 11 日，江西宜春豐城市富士康員工上千員工堵斷國道交通，與員警對峙發生衝突。⁴⁸

這些富士康的罷工和集體騷動，大致看來，並不是有組織、有秩

45 為何裕元工人沒有人出來要求民主組織工會，甚至沒有人願意出面擔任工人代表？這是另一個研究問題，以本田及其他進行集體協商的工廠為例，它們的規模小（百人或一千多人），有助於工人社會網絡、相互信任、群體認同的建立；且工人的同質性高。這些要件，裕元都不具備。

46 大紀元，2012，〈富士康太原騷動事件 外媒剖析緣由〉，9 月 28（網址 <http://www.epochtimes.com/b5/12/9/28/n3693249.htm>，取用日期：2015 年 10 月 28 日）。

47 新浪財經網，2012，〈消息稱富士康鄭州工廠發生大規模衝突〉，10 月 6 日（網址 <http://finance.sina.com.cn/china/20121006/115313296194.shtml>，取用日期：2015 年 10 月 28 日）。

48 自由亞洲電台，2013，〈江西富士康數千員工罷工要求改善待遇〉，1 月 11 日（網址 http://www.rfa.org/cantonese/news/foxconn_strike-01112013092458.html，取用日期：2015 年 10 月 28 日）。

序的集體抗爭，多為嚴厲廠區管理和勞動體制之下，導致工人積怨爆發。爆發之後，往往工人以激烈的打砸燒行為引起關注或洩憤；但抗爭的延續時間只有一、兩天，很快就被平息，回復正常生產。和 2010 年的本田罷工，以及本文分析的 2014 年裕元罷工，都很不一樣。究其因，富士康工人的人口特質和社會關係，如年輕、教育程度低、流動大、社會關係疏離等，都和本田及裕元，有明顯的差異。

從裕元的大罷工顯示，當代中國集體抗議的發生、過程、結果，背後是多重機制的互動而成。具體而言，本文案例的機制包括：(1) 動員的自發性，罷工是在沒有核心領導，無公開串聯組織、但私下有多個小群積極份子的策動之中進行；(2) 生態及網路空間的人際關係，罷工利用空間環境為基礎的人際關係及網路空間、社交媒體的訊息傳遞；(3) 外來勞工組織積極份子的知識技術支援，提供法律諮詢和策略方向；(4) 法律主義的權益訴求，標舉國家法律明言保障的工人社保權益，逼使資方及地方政府陷入窘境；(5) 情感和符號的驅動作用，以民族主義話語和敵我矛盾，搭載怨恨情結、謠言指控，使得組織性差的動員能夠擴散、持久。

另一方面，面對工人抗爭的資方和政府，罷工初期各有不同的利益考量和誘因導向，資方寄望政府出面化解，也配合政府指示先不妥協，先做有限讓步，但政府及資方低估了工人罷工的能量。當罷工延燒擴大，政府和資方各自的利益和誘因，歧異越來越大；資方受到國際買主的壓力，企圖花錢買穩定恢復生產，地方政府受到海內外媒體注視、上級政府的指示和考核，工人高舉法律的大旗，政府必須符合法律規範和社會期待。

一般而言，地方政府針對人民反抗的處理模式，就如李靜君和張永宏 (Lee and Zhang 2013) 所言，藉由買穩定、官僚吸納、或庇護體系等三種操作過程，吸納人民的反抗。但萬一遇到無法吸納工人大規模集體抗爭時，地方政府轉而藉由國家機器的監視和暴力鎮壓、控制集體抗爭在有限範圍。地方政府必須承受集體抗爭帶來的政治後果，例如中央政府原本賦予地方的政策空間和彈性原則，會因為社會抗爭高

舉法律令旗，導致地方政策被修正，地方既有的非正式制度也會因此轉型。如此，即使大規模的罷工，也有利於及時釋放導致社會動盪的矛盾和怨恨，不會挑戰威權政體的合法性。工人也從 NGO 及學者文獻中，得知罷工本身並不違法（常凱 2012；Chang and Cooke 2015）國家在處理集體抗爭事件的過程中，展現了其專斷性的權力。地方政府藉由社保局、工會、公安國保等多個部門，控制了大罷工的動態。國家是制訂遊戲規則者，本該是民眾抗議爭取權益的訴求對象，但當今中國政府轉換自身角色為仲裁者，利用政府工會及共產黨組織系統，進入企業組織仲裁勞資衝突。也就是說，國家藉由政府職能部門、公安情治的武力、及工會的組織，多重角色配合來處理集體抗議，由此建立對集體抗爭事件的制度化能力，在短期內控制社會衝突，避免損害威權政體的合法性。

裕元罷工事件，凸顯了當前中國威權主義政體的轉型和挑戰。威權政體既要維繫合法性和權力，也需要有效治理社會衝突和集體反抗。大罷工的訴求和劇碼，超出政府的控制範圍，當工人高舉中央頒布的法律「依法抗爭」，在國家試圖納入以法制作為統治合法性的過程中，得到著力點；當抗爭人數多、時間久、場面大，就可能會成功達到訴求。這是一種政治過程 (political process)，衝擊了資本家和地方政府慣存的政商互利治理模式。抗爭群體藉由集體行動展現壓力，糾正地方政府在執行中央法律政策中的變通性，上級政府也藉此重新確認中央決策的有效性和普及性、縮小地方政府的恣意性和權力空間，改變地方治理政商合謀的遊戲規則。⁴⁹ 因此，集體抗爭成為當今國家與社會關係改變的重要推動力。

49 這也是針對權威體制與有效治理矛盾的應對機制，姑且稱之為「集體抗議與地方回應的治理模式」。這可說是周雪光 (2011) 的三種應對機制（一統與變通、政治教化、運動型治理）之外的第四種。

誌謝詞：本研究獲得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當代中國社會抗爭與國家治理：抗議事件新聞資料庫計畫」(NSC 100-2628-H-001 -006) 經費資助；田野訪談過程中，獲得許志松、廖卿樺、羅兆匡的重要協助；本文初稿寫作發表過程中，得到多位同仁提供寶貴意見，包括：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同仁、林南、李靜君、陳峰、趙鼎新、鄧燕華、周雪光、Elizabeth Perry等，以及編委會和兩位匿名審查人的批評指正，謹此誌謝。

參考文獻

- Grrr 新浪微博, 2014 a, 〈東莞裕元罷工(三) 4 月 16 日〉(網址 <http://wickedonna2.tumblr.com/post/82954619400/4-16>, 取用日期: 2014 年 10 月 1 日)。
- Grrr 新浪微博, 2014 b, 〈東莞裕元罷工(五) 4 月 18 日〉(照片)(網址 <http://wickedonna2.tumblr.com/post/83123440287/4-18>, 取用日期: 2015 年 10 月 28 日)。
- 大紀元, 2012, 〈富士康太原騷動事件 外媒剖析緣由〉, 9 月 28 (網址 <http://www.epochtimes.com/b5/12/9/28/n3693249.htm>, 取用日期: 2015 年 10 月 28 日)。
- 工評社, 2014, 〈與裕元一位老工人的深度訪談〉4 月 27 日(網址 http://blog.sina.com.cn/s/blog_ed2baf420101wdoo.html, 取用日期: 2015 年 10 月 28 日)。
- 工評社, 2014, 〈與裕元一位老工人的深度訪談〉4 月 27 日(網址 http://blog.sina.com.cn/s/blog_ed2baf420101wdoo.html, 取用日期: 2015 年 10 月 28 日)。
- 中國工人編輯部, 2012, 〈從冠星廠事件看工資集體談判——段毅律師專訪〉。《中國工人》5: 4-11。
- 中國茉莉花革命網站, 2014, 〈東莞台資鞋廠數千工人維權堵路〉(25 圖), 4 月 6 日(網址 <http://www.molihua.org/2014/04/22.html>, 取用日期: 2015 年 10 月 28 日)。
- 中國集體談判論壇, 2012, 〈關於廣州市番禺恒寶飾物有限公司工人代表被刑拘事件的調查報告〉(<http://www.dgzngo.cn/?p=792>, 取用日期: 2013 年 11 月 5 日)。
- 中國新聞網, 2014, 〈東莞最大鞋廠幾千工人抗議廠方社保標準過低〉4 月 5 日(網址 <http://www.chinanews.com/sh/2014/04-05/6034322.shtml>, 取用日期: 2015 年 10 月 28 日)。
- 自由亞洲電台, 2013, 〈江西富士康數千員工罷工要求改善待遇〉, 1 月 11 日(網址 http://www.rfa.org/cantonese/news/foxconn_strike-01112013092458.html, 取用日期: 2015 年 10 月 28 日)。
- 自由亞洲電台, 2014, 〈東莞台資鞋廠數千人罷工堵路抗議〉, 4 月 6 日(網址 <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shehui/yf-04062014101935.html?searchterm:utf8:ustring=%E8%A3%95%E5%85%83>, 取用日期: 2015 年 10 月 28 日)。

- 何明修，2011，〈導論：探索台灣的運動社會〉。頁 1-32，收錄於何明修、林秀幸編，《社會運動的年代：晚近二十年來的台灣行動主義》。台北：群學。
- 吳介民，2011，〈永遠的異鄉客？公民身分差序與中國農民工階級〉。《台灣社會學》21: 51-99。
- 吳麗瑋，2012，〈太原富士康騷亂：年輕人與大工廠〉，《三聯生活週刊》10月18日（網址 <http://www.lifeweek.com.cn/2012/1018/38860.shtml>，取用日期：2015年10月28日）。
- 汪宏倫，2013，〈當代中國民族主義的多重變貌：形式結構與質料內涵的解析〉。論文發表於「台灣：族群、民族與現代國家的經驗與理論研討會」。台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2013年10月25日。
- 汪建華，2011，〈互聯網動員與代工廠工人集體抗爭〉，《開放時代》11: 114-128。
- 汪建華、石文博，2014，〈爭奪的地帶：勞工團結、制度空間與代工廠企業工會轉型〉。《青年研究》1: 53-61。
- 兩岸三地高校富士康調研組，2010，《富士康調查報告》系列二：〈富士康生產體制——規訓與懲罰的勞動集中營〉；系列三：〈生活空間——囚在富士康帝國〉。引自苦勞網（網址 <http://www.coolld.org.tw/node/55059>；<http://www.coolld.org.tw/node/55062>，取用日期：2015年10月28日）。
- 周雪光，2011，〈權威體制與有效治理：當代中國國家治理的制度邏輯〉。《開放時代》10: 67-85。
- 孟春，2010，〈階級覺醒的新曙光——記南海本田汽車零部件公司工人的罷工〉（<http://www.worldlabour.org/chi/node/363>，取用日期：2010年6月6日）。
- 東風編輯部，2014，〈本田罷工回顧〉（<http://www.ilabour.org/Item/Show.asp?m=1&d=3216>，取用日期：2014年8月12日）。
- 東莞市人民政府辦公室，2010，〈市政府工作會議紀要〉（2010）102號，8月14日（網址 http://www.chinadmd.com/file/zxrevvxtzpssc3ecprwoat3r_1.html，取用日期：2015年10月28日）。
- 東莞市商務局，2011，〈來料加工企業不停產轉三資企業常見問題解答〉（網址 <http://www.dgboftec.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wjj/s31338/201201/461307.htm>，取用日期：2015年10月28日）。
- 東莞市統計調查信息網，2013，《東莞統計年鑑》（網址 http://tjj.dg.gov.cn/web-site/flaArticle/art_show.html?code=nj2013&fcount=2，取用日期：2015年10月28日）。
- 東莞裕元製造廠員工暨支持勞工維權的勞工界、社會各界人士，2014，〈裕元工

- 友暨勞工界、社會各界人士呼籲廣東省總工會依法履行職責的連署公開信〉4月7日，詳見（網址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oNetry0CZrkNntzjT5pJ5tJuhzlkBQ_jwaZ7RzshOpM/pub，取用日期：2015年10月28日）。
- 林宗弘、曾惠君，2014，〈戶口的政治：中國大陸與台灣戶籍制度之歷史比較〉。《中國大陸研究》57(1): 63-96。
- 邱毓斌，2011，〈工會做為階級行動者？對台灣與香港獨立工會運動的歷史考察〉。《香港社會科學學報》41: 85-124。
- 馬倩，2014，〈春風社——帶來工人維權春風〉，《亞洲週刊》第28卷17期（5月4日），頁31-33。
- 常凱，2012，〈關於罷工的合法性及其法律規制〉。《當代法學》26(5): 109-117。
- 張治儒，2014〈著名勞工機構春風勞動爭議服務部主任張治儒給裕元鞋廠工友們的一封信公開信〉4月17日（網址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d8d48790101jpol.html，取用日期：2015年10月28日）。
- 郭于華、沈原、潘毅、盧暉臨，2011，〈當代農民工的抗爭與中國勞資關係轉型〉。《二十一世紀評論》4: 4-14。
- 陳峰，2009，〈國家、制度與工人階級的形成——西方文獻及其對中國勞工問題研究的意義〉。《社會學研究》5: 165-188。
- 陳敬慈，2012，〈勞工、資本與國家：馬克思主義視角下的中國勞資衝突〉。《台灣社會學刊》50: 165-204。
- 傅高義，2008，《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廣東》。廣州：廣東人民。
- 彭昉，2007，〈計時趕工的霸權體制：對華南一家加工出口台資廠的勞動體制研究〉。《台灣社會學》14: 51-100。
- 新青年網頁，2014，〈2014年4月15-17日若干微博報導：裕元鞋廠大罷工第2-4天的有關情況〉（含照片）（網址 <http://www.youth-sparks.com/bbs/viewthread.php?tid=4086&page=1#pid21074>，取用日期：2015年10月28日）。
- 新浪財經網，2012，〈消息稱富士康鄭州工廠發生大規模衝突〉，10月6日（網址 <http://finance.sina.com.cn/china/20121006/115313296194.shtm>，取用日期：2015年10月28日）。
- 新浪微博@darkumnm，2014年4月5日（網址 <http://wickedonna2.tumblr.com/post/81780266638/4-5>，取用日期：2015年10月28日）
- 新華社，2014，〈東莞「代工廠」勞資糾紛引發風波〉4月19日（網址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www.gd.xinhuanet.com/newscenter/2014-04/19/c_1110315118.htm，取用日期：2015年10月28日）。

- 楊友仁，2014，〈社會疏離與勞動體制：深圳富士康新生代農民工的都市狀態初探〉。《台灣社會研究》95: 57-108。
- 裕元工業（集團）有限公司，年代不詳，「裕元工業（集團）有限公司——生產設施」（網址 <http://www.yueyuen.com/index.php/about-us-5/equipments>，取用日期：2015 年 10 月 28 日）。
- 趙鼎新，2007a，《社會運動與革命：理論更新和中國經驗》。台北：巨流。
- ，2007b，《國家，社會關係與八九北京學運》。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 德國之聲，2014，〈珠三角危機：東莞裕元鞋廠爆發大罷工〉4 月 16 日（網址 <http://www.dw.de/%E7%8F%A0%E4%B8%89%E8%A7%92%E5%8D%B1%E6%9C%BA%E4%B8%9C%E8%8E%9E%E8%A3%95%E5%85%83%E9%9E%8B%E5%8E%82%E7%88%86%E5%8F%91%E5%A4%A7%E7%BD%A2%E5%B7%A5/a-17572723>，取用日期：2014 年 4 月 16 日）。
- 潘毅、陳慧玲、馬克·塞爾登，2015，《蘋果背後的生與死——生產線上的富士康工人》。香港：中華書局。
- 潘毅、盧暉臨、郭于華、沈原，2011，《富士康輝煌背後的連環跳》。香港：商務印書館。
- 蔡禾，2010，〈從「底線型」利益到「增長型」利益——農民工利益訴求的轉變與勞資關係秩序〉。《開放時代》9: 37-45。
- 鄭志鵬，2014，〈差序壓制型勞動體制：中國兩次勞動法在台資企業治理結果的政治經濟學分析〉。《台灣社會學刊》54: 75-129。
- 寶成國際集團，2014〈寶成國際集團法人說明會資料〉（網址 <http://www.pouchen.com/download/shareholders-meeting/140319%20pcc%20presentation-ch%20ml.pdf>，取用日期：2015 年 10 月 28 日）。
- Cai, Yongshun. 2010. *Collective Resistance in China: Why Popular Protests Succeed or Fail*.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Chan, Anita and Kaxton Siu. 2012. "Chinese Migrant Workers: Factors Constraining the Emergence of Class Consciousness." Pp. 79-101 in *China's Peasants and Workers: Changing Class Identities*, edited by Beatriz Carrillo and David S.G. Goodman. Northampton, MA: Edward Elgar.
- Chan, Chris King-Chi, and Ngai Pun. 2009. "The Making of a New Working Class? A Study of Collective Actions of Migrant Workers in South China." *China Quarterly* 198: 287-303.
- Chan, Chris King-Chi. 2013. "Community-Based Organizations for Migrant Workers' Rights: The Emergence of Labour NGOs in China." *Community Development Journal*

48(1): 6-22.

Chan, Chris King-Chi, and Elaine Sio-Ieng Hui .2012. "The Dynamics and Dilemma of Workplace Trade Union Reform in China: The Case of the Honda Workers' Strike. "

Journal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54(5): 653-668

Chan, Jenny, Ngai Pun and Mark Selden. 2013. "The Politics of Global Production: Apple, Foxconn, and China's New Working Class." *New Technology, Work and Employment* 28(2): 100-115.

Chang, Kai, and Fang Lee Cooke. 2015. "Legislating the Right to Strike in China: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Prospects." *Journal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57(3): 440-455.

Chang, Kai, and William Brown. 2013. "The Transition from Individual to Collective Labour Relations in Chian." *Industrial Relations Journal* 44(2): 102-121.

Chen, Feng. 2003. "Between the State and Labour: The Conflict of Chinese Trade Unions' Ddouble Identity in Market Reform." *The China Quarterly* 176: 1006-1028.

———. 2010. "Trade Unions and the Quadripartite Interactions in Strike Settlement in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201: 104-124.

Chen, Feng and Mengxiao Tang. 2013. "Labor Conflicts in China: Typologies and Their Implications." *Asian Survey* 53(3): 559-583.

Chen, Xi. 2012. *Social Protest and Contentious Authoritarianism in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hen, Chih-Jou Jay. 2013. "Die Zunahme von Arbeitskonflikten in China: Ein Vergleich von ArbeiterInnenprotesten in verschiedenen Sektoren (Growing Labor Disputes in China: A Comparison of Workers' Protests in Different Sectors)." Pp. 78-105 in *Arbeitskämpfe in China: Berichte von der Werkbank der Welt*, edited by Georg Egger, Daniel Fuchs, Thomas Immervoll and Lydia Steinmassl. Wien: Promedia.

Elfstrom, Manfred and Sarosh Kuruvilla. 2014. "The Changing Nature of Labor Unrest in China." *Industrial and Labor Relations Review* 67(2): 453-480.

Franceschini, Ivan. 2014. "Labour NGOs in China: A Real Force for Political Change?" *The China Quarterly* 218: 474-492.

Friedman, Eli. 2009. "External Pressure and Local Mobilization: Transnational Activism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Chinese Labor Movement." *Mobilization: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14(2): 199-218.

———. 2014. *Insurgency Trap: Labor Politics in Postsocialist China*.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Friedman, Eli and Ching Kwan Lee. 2010. "Remaking the World of Chinese Labour: A 30-Year Retrospective." *British Journal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48(3): 507-533.
- Gallagher, Mary E.. 2005. "'Use the Law as Your Weapon!':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Legal Mobilization in China." Pp. 54-83 in *Engaging the Law in China: State, Society, and Possibilities for Justice*, edited by Neil Jeffrey Diamant, Stanley B Lubman, and Kevin J. O'Brien.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Gallagher, Mary E.. 2014. "China's Workers Movement and the End of the Rapid-Growth Era." *Daedalus* 143(2):81-95.
- Granovetter, Mark. 1978. "Threshold Models of Collective Behavior."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3(6): 1420-1443.
- Hess, Steve. 2015. "Foreign Media Coverage and Protest Outcomes in China: The Case of the 2011 Wukan Rebellion." *Modern Asian Studies* 49(1): 177-203.
- Honneth, Axel. 1996. *The Struggle for Recognition: The Moral Grammar of Social Conflict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Hsu, Jennifer Y.J. and Reza Hasmath. 2014. "The Local Corporatist State and NGO Relations in Chin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3(87): 516-534.
- Le Bon, Gustave. 2002 [1867]. *The Crowd: A Study of the Popular Mind*.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Reprint edition.
- Lee, Ching Kwan. 1998. *Gender and the South China Miracle: Two Worlds of Factory Wome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 2007. *Against the Law: Labor Protests in China's Rustbelt and Sunbelt*.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Lee, Ching Kwan and Yuan Shen. 2011. "The Anti-Solidarity Machine? Labor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in China." Pp. 173-187 in *From Iron Rice Bowl to Informalization: Markets, Workers, and the State in a Changing China*, edited by Sarosh Kuruvilla, Ching Kwan Lee, and Mary E. Gallagher. Ithaca, NY: ILR Press.
- Lee, Ching Kwan and Yonghong Zhang. 2013. "The Power of Instability: Unraveling the Microfoundations of Bargained Authoritarianism in China."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18(6): 1475-1508.
- Li, Chunyun and Yi Duan. 2013. "Between Labor and the State: The Origin and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Labor NGOs." Paper presented at Chinese Association of Work and Labor Studies Annual Meeting, Beijing, December 28.
- Lin, Thung-Hong, Yi-ling Lin and Wei-Ling Tseng. Forthcoming, "Manufacturing Suicide: The Politics of a World Factory." *Chinese Sociological Review*.

- Mann, Michael. 1984. "The Autonomous Power of the State: Its Origins, Mechanisms and Results."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ology / Archives Européennes de Sociologie* 25(2): 185-213.
- O'Brien, Kevin J, and Lianjiang Li. 2006. *Rightful Resistance in Rural Chin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Perry, Elizabeth J.. 2009. "A New Rights Consciousness?" *Journal of Democracy* 20(3): 17-20.
- Peng, Thomas. 2011. "The Impact of Citizenship on Labour Process: State, Capital and Labour Control in South China." *Work, Employment and Society* 25(4): 726-741.
- Pun, Ngai and Chris Smith. 2007. "Putting Transnational Labour Process in Its Place: The Dormitory Labour Regime in Post-Socialist China." *Work, Employment and Society* 21(1): 27-45.
- Spires, Anthony J., Lin Tao and Kin-man Chan. 2014. "Societal Support for China's Grass-Roots NGOs: Evidence from Yunnan, Guangdong and Beijing. *The China Journal* 71: 65-90.
- Shirk, Susan L.. 2010. *Changing Media, Changing Chin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u, Yang and Xin He. 2010. "Street as Courtroom: State Accommodation of Labor Protest in South China." *Law and Society Review* 44(1):157-184.
- Sun, Yanfei and Dingxin Zhao. 2008. "Environmental Campaigns." Pp. 144-162 in *Popular Protest in China*, edited by Kevin J. O'Brie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Tarrow, Sidney. 1998. *Power in Movement: Social Movements, Collective Action and Politics* (2nd e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Tong, Yanqi. 2005. "Environmental Movements in Transitional Societie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aiwan and China." *Comparative Politics* 37(2): 167-188.
- Whyte, Martin King. 2014. "Soaring Income Gaps: China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Daedalus* 143(2): 39-52.
- Wong, Chun Han. 2015. "China Labor Ties Fray as Grievances Rise, Economic Growth Slows." In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http://www.wsj.com/articles/china-labor-ties-fray-as-grievances-rise-economic-growth-slows-1423528666> (Data visited: January 9, 2015)
- Wu, Jieh-min. 1997. "Strange Bedfellows: Dynamics of Government-Business Relations between Chinese Local Authorities and Taiwanese Investors." *Journal of*

- Contemporary China* 6(15): 319-346.
- Yang, Guobin. 2000. "Achieving Emotions in Collective Action: Emotional Processes and Movement Mobilization in the 1989 Chinese Student Movement." *The Sociological Quarterly* 41(4): 593-614.
- , 2005, "Environmental NGOs and Institutional Dynamics in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181(1): 44-66.
- . 2013. *The Power of the Internet in China: Citizen Activism Onlin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Zhao, Dingxin. 2013. "The Build Environment and Organization in Anti-US Protest Mobilization after the 1999 Belgrade Embassy Bombing." Pp. 199-218 in *Spaces of Contention: Spatialities and Social Movements*, edited by Walter Nicholls, Byron Miller and Justin Beaumont. Farnham, Surrey: Ashgate.